

單

面

人

〔美〕赫伯特·馬爾庫塞 著

左曉斯 張宜生 蕭濱 譯

谷風出版社

爾庫塞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被稱為青年學生造反運動的教科書。它借用黑格爾、馬克思、薩特以及弗洛伊德等人的一些觀點，對當代發達工業社會，主要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和東方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政治以及文化思想進行了全面的批判性分析，展望了當代社會的暗淡前景。

譯者前言

使哲學從純粹學術圈子中擺脫出來，並結合到現實中去，這是歷史上一些偉大哲學家及哲學流派的一個思想特徵，法蘭克福學派就是這樣一個突出的典型。

這一流派的主要工作便是把哲學作為分析批判的工具，對社會現實的各個層面進行深入剖析，並試圖開出根治當代發達社會弊端的靈丹妙藥。它的社會哲學理論被稱為社會批判理論。它的一些傑出代表以“馬克思主義現代化者”自居，也的確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現狀和前景進行了系統分析，提出了較為激進的看法，被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德、法新左派運動奉為“發達工業社會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家”，認為他們指出了當代社會“最基本最迫切的問題”；他們中一些人的著作被奉為指導思想和行動的理論武器，標準的造反教科書，以致他們的思想在西方廣為傳播，其影響經久不息。

在法蘭克福學派中，最著名、最有影響、最激進因而也最受西方造反青年愛戴和尊敬的是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

赫伯特·馬爾庫塞 1898 年出生於柏林一個猶太血統的資產階級家庭。1917—1919 曾參加過德國社會民主黨左翼，並一度是柏林萊因契根道夫的士兵委員會委員。不久，革命因

敵人鎮壓和叛徒出賣而失敗，馬爾庫塞也因不滿社會民主黨背叛革命的行徑而退出該黨，從此便脫離政治運動。他先後到柏林大學和弗萊堡大學學習，當過現象學大師胡塞爾和存在主義創始人之一海德格爾的學生。1922年，在海德格爾的指導下寫成博士論文《黑格爾的本體論及其歷史理論的基本原理》，獲弗萊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爾後從事書籍的出版和發行，1929年成為海德格爾的助手。1932年因與海德格爾在政治觀點上有分歧而離開弗萊堡大學。此時他正好遇上了剛剛上任、正到處收羅人才的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所長馬克斯·霍克海默，於是便到該所工作。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離開德國，先去瑞士，在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設在日內瓦的辦事處任職。1934年到了美國，從此一直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與霍克海默及阿多諾一起工作。1940年起他成為美國公民。二次大戰期間，曾任華盛頓戰略研究局研究員。1950年任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處東歐組代理組長。1951年在哥倫比亞大學俄國研究所和哈佛大學俄國研究中心工作。1954年至1967年在勃蘭第斯大學任務，1967年後轉到加利福尼亞大學。1979年7月29日在應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之邀赴西德講學途中逝世，終年81歲。馬爾庫塞的主要著作有：《理性與革命》（1941）、《愛欲與文明》（1955）、《蘇聯馬克思主義》（1958）、《單面人》（1964）、《革命倫理學》（1966）、《論否定》（1968）、《論解放》（1968）、《從富裕社會中解放出來》（1969）、《自由和歷史使命》（1969）、《反革命與起義》（1972）。二戰以後直至逝世，馬爾庫塞在所寫著作中，對資本主義社會

的種種弊端進行了系統而尖銳的批判。因而他的理論被人們稱為“青年造反哲學”。他與霍克海默、阿多諾等不同。在實際行動中他一貫同情和支持西方社會中激進的學生運動，堅持用現代烏托邦革命理論去指導新左派運動。他還強烈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侵越戰爭及其鎮壓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行徑。為此，他不斷接到恐嚇信，甚至受到死亡的威脅。然而，也正是他理論和行動上的一貫性和堅定性，使他受到了工人和青年學生的愛戴和尊敬，被奉為“學生運動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明星和精神之父”，成為“新左翼”“最有影響的思想家”。

《單面人》是馬爾庫塞最有影響的哲學著作之一，被稱為青年學生造反運動的教科書。該書1964年由波士頓燈塔出版社出版，但由於某種原因，直到1965年才付印發行。

《單面人》借用黑格爾、馬克思、薩特以及弗洛伊德等人的一些觀點，對當代發達工業社會，主要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和東方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政治以及文化思想進行了全面的批判性分析，展望了當代社會的暗淡前景。正因為這樣，它助長了新左派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厭惡以及對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望，因而很合新左派運動及青年造反者的口味，受到西方世界相當一部分人的極高評價。

該書共分三篇十章。第一篇《單面社會》全面分析了當代發達工業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學藝術、語言文字中的同化與整合趨勢，認為技術理性正替代政治理性而成為社會新控制形式。政治域與論域都處於封閉之中，不幸意識正被幸福意識取而代之，單面性深入到了人的精神深層甚至本能中，一切超越因

素都受到拒斥。總之，社會正失去其雙面性（否定與肯定）而成為只有（肯定面）的單面社會。

第二篇《單面思想》深入地分別論述了邏輯、科學技術及語言學中的整合、同化及單面性。認為辯證邏輯已經失效，科學先在地是技術的，科學自身的發展也揭示了科學的技術先天性，科學與科學應用不可分離，語言日益失去其批判和超越功能而成為操作工具。

第三篇《替代的機會》分析了哲學的歷史制約性及其在當前條件下的可悲結局，分析了替代當代單面社會的不可能性。他認為，哲學受制於其所處的時代。當代單面社會已不同於從前雙面社會，由於從前社會同時還具有否定的一面，那時的哲學便往往能站在時代的前列，否定既定社會，指出社會前進的新方向；而今日社會的一切已與既定秩序同化，再也不存在否定與超越因素，因而作為時代精神反映的哲學也就不再對社會進行理論上的否定，也不能指出全新的前進方向。而解放是有前提條件的，這些前提條件創造了各種壓抑需要等等，它們反過來阻礙解放。從當前社會現狀看，人們的抗議不但不能顛覆該社會，反而通過適當調整和讓步，促進了社會的鞏固，替代單面社會之希望十分渺茫。

《單面人》中表述了一些很有爭議的觀點：比如經典馬克思主義過時了，需要加以現代化；蘇聯的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的發展是單面社會因而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根源之一；人類社會的前景暗淡等等，這些究竟該如何來看呢？

正如馬爾庫塞對“歷史的”一詞的強調那樣，我們應當從

他得出這些觀點的歷史背景中去理解。馬爾庫塞經歷了兩次殘酷的世界大戰，經歷了東西方特別是蘇美之間的冷戰時期，目睹了蘇聯工業化中斯大林所犯的嚴重錯誤，以及這些錯誤造成的後果和影響，也看到了超級大國及其他列強對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征服與奴役。他深深感受到科學技術帶來的對人性的摧殘（儘管科學也帶來滿足與舒適）、帶來的核戰爭威脅，在《單面人》中通篇都可以看到這些經歷的影響。同時，當代發達工業社會也的確不同於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的狀況，馬克思的預言和理論中也的確有一些不盡準確的地方。儘管馬爾庫塞不免有偏差，但他的確作了深入的探索。一味斥責他在替“資本主義作辯護，在誹謗社會主義”等等，無助於正確吸取馬爾庫塞《單面人》一書中的合理思想。而且，我們相信，讀者在讀通全書之後，對上述問題自然會有自己的公允結論。

《單面人》一書比較難讀。這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它與一般純哲學著作不同，它是“社會批判”的哲學論著，對社會現象與對哲學的分析、對精神與對文化的分析在此熔為一體。因而有時非常抽象，有時又非常具體。二是讀來似乎讓人覺得作者的思想忽左忽右，自相矛盾，難以把握。對於前者，最好能從全書總體去把握；對於後者，則可記住馬爾庫塞自己的話：“《單面人》將通篇在兩個相互矛盾的假說間躊躇：(1)為著可以預見的將來，發達工業社會能夠包容質變；(2)存在著這樣的力量和趨勢，它們可以打破這種包容……兩個趨勢都在那裏，並立存在——而且甚至一個存在於另一個之中。”也就是說，這是現實矛盾在他思想中的反映。

• 6 • 單面人

此書的翻譯由左曉斯、張宜生及蕭濱合作完成。其中導言、第一至第四章由左曉斯負責，第五至第七章由張宜生負責，第八至十章由蕭濱負責，全書由左曉斯統稿、修改、校對。中山大學哲學系胡景釗教授審定了本譯稿，在此致以衷心感謝。

左曉斯
1987年12月

目 錄

導 言 批判主義的無能：沒有對抗的社會 1

第一篇 單面社會

第一章 新的控制形式.....	3
第二章 封閉中的政治域.....	20
第三章 征服不幸意識：壓抑性非昇華.....	56
第四章 封閉中的論域.....	82

第二篇 單面思想

第五章 否定思想：失敗的抗議邏輯.....	119
第六章 從否定思想到肯定思想：技術理性與統治邏輯.....	138
第七章 肯定思想的勝利：單面哲學.....	164

第三篇 替代的機會

第八章 哲學的歷史制約.....	197
第九章 解放的結局.....	218
第十章 結論.....	239

導 言

批判主義的無能：沒有對抗的社會

能夠滅絕人類的原子災難的威脅，也沒有用來保護那些使這一危險永存的力量嗎？阻止這種災難的努力，遮蔽了對這種災難在當代工業社會中的可能根源之探索。這些根源仍未受到公衆的確認、揭露和抨擊，因為它們退居到了來自外部——對西方來說是來自東方，對東方來說來自西方——的過於明顯的威脅之後。同樣明顯的是，需要有所準備，需要在絕境的邊緣活下去，需要面對挑戰。我們屈從於毀滅手段的生產，屈從於純粹的浪費，屈從於為扭曲了捍衛者和被捍衛者的防禦而受教育。

如果我嘗試著把這一危險的根源和組織社會以及組織社會成員的方式關聯起來，我們馬上會發現這樣一個事實：隨著這一危險的永恒化，發達工業社會變得越來越富有，越來越龐大，也越來越體面。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防禦結構使得生活更為輕鬆自得，並大大擴展了人對自然的支配。在這種情況下，宣傳工具要使人們接受聰明人的影響就不會有多少困難。社會的政治需要變成了個人的需要和志向，這些需要和志向的滿足又推動了事業與公益，看來一切正是理智的體現。

然而，作為整體來說，這個社會仍然是反理性的。它的生

產力對人的需要及能力的自由發展是破壞性的，它的和平由永恒的戰爭威脅維持著，它的增長依賴於對緩和（個人的、國家的及國際的）生存鬥爭之現實可能性的壓抑。這種壓抑，完全不同於作為我們社會從前不那麼發達階段的特徵的壓抑，它不再是由於自然和技術的不成熟性而起作用，倒是為著強化的目的。當代社會（精神和物質）的能力比從前任何時候都強到不可估量——這意味著社會對個人的統治範圍也比從前大到不可估量。在壓倒的高效率和日益增長著的生活標準的雙重基礎上，我們社會用技術而不是恐怖征服了社會離心力量，從而使自己卓越超群。

研究這些發展的根源並考察它們的歷史替代，乃是當代社會批判理論目標之組成部分，這一批判理論根據其已用和未用或濫用的改善人的狀況的能力分析社會。可是，這樣一種批判的標準是什麼呢？

價值判斷肯定在起作用。組織社會的既定方式是相對其它可能方式來評價的，有人堅持認為，這些可能方式能為緩和人的生存鬥爭提供更好的機會；而一獨特的歷史實踐，是相對它自己的歷史替代來評價的。於是任何社會批判理論從一開始，便遇到了歷史的客觀性問題，這個問題在分析暗示了價值判斷的兩個地方產生：

1. 人的生活值得過下去或能夠和應當使之過下去的判斷。這一判斷構成了一切知識所追求的基礎；它是社會理論中的先驗判斷，拒斥它（這完全合乎邏輯）就拒斥了理論本身。

2. 在一特定社會，存在著改善人的生活的特殊可能性和實現這些可能性的獨特方式和手段。批判理論必須證明這些判斷的客觀合理性，且證明必須在經驗的基礎上進行。既定社會擁有確定的可用知識及物質資源的質和量。怎樣才能用這些資源使個人的需要和能力得到最佳的滿足和發展，而又只付出最少的辛勞苦難？社會理論是歷史理論，而歷史是必然王國中的偶然王國。因此，在組織和利用這些可用資源的各種可能而又實際的方式中，哪些方式能為最優發展提供最大機會？

回答這些問題的嘗試要求一系列初始的抽象。為了辨認和確定最優發展的各種可能性，批判理論必須從社會資源的實際組織和利用中抽象，從這種組織和利用的結果中抽象。這樣的抽象拒絕把特定事實域作為最終證明來接受，這種根據其受壓抑和被否定的可能性對事實的“超越”^①分析，正適合於社會理論的結構。根據“超越”的嚴格歷史特性，這種分析與所有形而上學對立。這些“可能性”必須處於相應社會的範圍內；必須是可以確定的實踐目標。據此看來，從既定機構制度中得來的抽象，必須是對一種實際趨勢的表達——也就是說，它們

① “超越”(transcend)與“超越”(transcendence)兩個詞完全是在經驗批判的意義上使用的，它們表示的是理論和實踐中這樣一些趨勢，在特定社會中，這些趨勢越過(overshoot)既定論說和行動域，向著它的歷史替代(現實可能性)前進。

· 4 · 單面人

的轉變必須是下層人的真實需要。社會理論關心的是歷史的替代，這些替代作為破壞性的趨向和力量死死纏住既定社會。當它們由歷史實踐轉變為現實時，屬於它們的價值觀念也就確確實實變成了事實。理論性概念隨社會的變遷而終結。

但是，發達工業社會處在似乎剝奪了其基礎的情景中，它在此遇到了這種批判。技術進步擴展到了整個控制與調節系統，並創造出了這樣一些生活（和權力）形式，這些形式看起來調和了與這個系統對立的力量，擊敗或駁倒了所有以擺脫勞役和控制的歷史前景之名提出的抗議。當代社會似乎能包容社會變化——將確立根本不同的制度機構、生產過程新方向以及人類生存新方式的質變。這種對社會變化的包容，也許是發達工業社會最卓絕的成就。對國家意願及兩黨支持的政策的普遍接受，多元主義的衰落，富裕國家勞務與商務的融合，如此等等，都證明了既是這一成就的結果又是其前提條件的對立面的整合。

對工業社會理論形成階段與其當前狀況作一簡短比較，可能有助於表明這種批判的標準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在它於十九世紀上半葉誕生的時候，當它提出了第一批替代概念的時候，對工業社會的批判在理論與實踐、價值觀念與事實、需要與目標等等之間的歷史中介作用中獲得了實在性。歷史中介作用出現於該社會相互對立的兩大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意識和政治行動中。在資本主義世界裏，它們仍然是基本的階級。然而，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以這樣一種方式改變了這兩大階級的結構和作用，即它們不再以歷史轉變的動力出現。一種維護和改進現存制度的壓倒興趣，把當代社會中最發達

地區從前的對手聯合起來。而且，在技術進步保證了共產主義社會的增長和團結這個程度上，質變的觀念退居到了現實主義的非爆發性進化概念之後。在可表明的社會變化之動力及其代表缺乏的情況下，批判就這樣被拉回到了高度的抽象層次。不存在理論與實踐、思想和行動相結合的土壤。甚至對歷史替代的最經驗性分析，看來也是非現實主義的思辯，並把它們歸於個人（或集團）的喜好問題。

然而，這種缺乏駁倒了理論嗎？面對明顯矛盾的事實，批判分析繼續堅持認為，對質變的需要仍如過去一樣迫切。誰需要？答案依然如故：作為整體的社會為著它的每一成員。增長著的生產力和增長著的破壞力的結合；玩弄毀滅性的邊緣政策；思想、希望及恐懼屈服於當局的決定；面對空前的健康而維持著苦難，所有這些，構成了最正義的控訴——即使它們不是該社會存在的理由而只是其副產品：提高效率和促進增長的蔓延開來的理性，本身是反理性的。

絕大多數人承認和被迫承認這個社會，這一事實並不使它不那麼反理性或不那麼應受譴責。真的與假的意識，真正的與當下的興趣等之間的區分仍然有意義。人們最終會理解這一點，並找到從假的意識到真的意識，從當下興趣到真正興趣的道路。只要生活於對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否定以及拒絕肯定的東西之需要中，他們就能做到這一點。在既定社會以日益擴大的規模不負所望、把對自然的科學征服用於對人的科學征服這種程度上，該社會努力壓抑的正是上述需要。

面對發達工業社會的成就的這一總特徵，批判理論被遺棄而未留下超越這一社會的理論說明，這部吸塵器抽空了理論結

構本身，因為批判理論的範疇是在這樣一個時期提出來的，當時，否定與破壞的需要體現在有效社會力量的行動中。這些範疇基本上是否定和對立的概念，規定了十九世紀歐洲社會的實際矛盾。“社會”這個範疇本身就反映了社會領域與政治領域間的實際衝突——社會與國家相對立。類似地，“個人”、“階級”、“私人”及“家庭”表示仍未與既定狀況即緊張與矛盾領域整合起來的圈子和力量相對立。隨著工業社會的日益整合，這些範疇漸漸失去了批判含義，趨向於變成描述性、欺騙性和操作性的用語。

重新把握這些範疇的批判意義，並理解這種意義如何為社會現實所抵消的嘗試，從一開始就顯得是從與歷史實踐相結合的理論向抽象思辯思想的回歸：從社會經濟的批判回歸到哲學。批判的這一意識形態特徵來源於這樣的事實：這種分析被迫從一個外在於社會中肯定的與否定的、生產性的與破壞性的趨勢這一角度進行。現代工業社會是這些普遍對立面的同一——它就是議論中的整體。同時，理論命題不能是純粹思辯的命題。就它必須建立在這個特定社會的能力的基礎上這個意義來說，它必須是一種歷史的觀點。

這種不明確的情形涉及到一種更為基本的模糊性。《單面人》將通篇在兩個相互矛盾的假說間躊躇：(1)為著可以預見的將來，發達工業社會能夠包容質變；(2)存在著這樣的力量和趨勢，它們可以打破這種包容，使該社會覆滅。我認為，沒有什麼清晰明確的答案可以給出。兩個趨勢都在那裏，並立存在——而且甚至於一個存在於另一個之中。第一個趨勢佔統治地位，而且任何可能存在逆轉的前提條件都被用來阻止這種逆轉。

或許，一個偶然事件可以改變整個趨勢，但除非對社會正在幹什麼及正在阻止什麼的認識攬亂了人們的這種意識和行為，否則，即使是一場巨大的災難也不能帶來變化。

分析集中於發達工業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裏，生產和分配（具有日益增加的自主化因素）的技術手段，不是作為能與其社會和政治後果隔絕開來的純粹儀器的總和，而是作為一個先驗地決定著這些手段的生產及使用和發揮這些手段之作用的操作系統在運轉。在該社會裏，生產手段在它不僅決定著社會所需要的職業、技能和態度，而且決定著個人的需要和志向這個程度上，趨向於變為極權主義者。技術用來建立新的、更有效和更賞心悅目的社會控制和社會調節形式。這些控制的極權主義趨勢似乎在另一種意義上——向世界較不發達甚至前工業地區擴展，以及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發展中創造出相似性——也表現了出來。

面對該社會的極權主義的特徵，技術“中立”的傳統概念再也維持不下去了。技術本身再也不能與對它的應用分離開來；技術社會是一個統治系統，它已經在按技術的思想和結構運轉。

社會組織其成員生活的方式，涉及到在由物質和精神文化的固有水平決定的歷史替代間進行一個最初選擇。這一選擇本身是佔支配地位的利益作用的結果。它預見了改造和利用人與自然的特有方式，並拒斥其他方式。除此之外，這一選擇還是一項現實化“規劃”。①但一旦這一規劃變成了基本制度中的操作，它就趨向於變成獨佔性的，並決定著作為整體的社會的

發展。作為技術世界，發達工業社會是一個政治世界，是一項獨特的規劃——即作為純粹統治要素的自然之經驗、改造和組織——現實化的最後階段。

隨著這一規劃的展開，它塑造了論說與行動、精神文化與物質文化這一整個世界的形態。在技術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經濟融合為一個無所不在的系統，這個系統同化或排斥掉所有替代。該系統的生產力和潛在的增長穩定了這個社會，同時把技術進步包容於其統治框架之中。技術理性已變成了政治理性。

在對發達工業文明流行趨勢的討論中，我很少有什麼特指。所使用的材料，在有關技術和社會變化、科學管理、法人企業、工榮勞務及勞動力量特性的變化等等浩瀚的社會學和心理學文獻中，都有集中的描述。對這些事實有許多非意識形態分析——比如伯利和米恩斯的《現代法人與私人財產》，第七十六屆國會臨時國家經濟委員會關於經濟力量的總的會議報告，美國勞聯—產聯關於自動化與重大技術變革的出版物，還有底特律的新聞、通信及反響。我願意強調 C·賴特·米爾斯的著作，以及由於簡單化、誇張和報刊式的輕鬆而頻頻引起人們批評的那些研究——萬斯·帕卡德的《神秘的威懾物》、《地位追求者》、《廢物製造者》，威廉·H·懷特的《組織化的人》，弗雷德·J·庫克的《戰爭狀態》都屬於這個範圍——的極端重要性。確實，這些著作中理論性分析的缺乏，使它們所

① “規劃”這個術語強調歷史決定中的自由與責任因素：它把自決性與偶發事件結合起來。在這種意義上，薩特的著作也使用了該術語。進一步的有關討論，見第八章末尾。

描述的狀況之根源有待於分析和辯護，但他們自己聽起來，這些狀況已說得足夠刺耳了。也許，說明問題的證據，可以通過簡單地接連幾天每天看上一小時的電視或以同樣方式聽收音機調幅台獲得，而不必中斷商業廣告節目而去聽國事節目。

我集中分析最高度發達的當代社會的趨勢。在這些社會的許多地區和領域，所描述的趨勢並不流行——我更願意說：還沒流行。我只表明這些趨勢的特點並提出一些假說，僅此而已。

第一篇

單面社會

第一章

新的控制形式

一種舒適、溫和、合乎情理且民主的不自由，正在發達工業社會盛行。這是技術進步的一個標誌。的確，沒有什麼比社會所需但又痛苦的工作的機械化過程中對個性的壓抑更合理的了；私人企業集中於更高效更高生產率的公司，調節不平等實力的經濟實體間的自由競爭，削弱國際對資源組織的特權及國家宗主權，這些也都是再合理不過了。這種技術秩序也涉及到政治和知識的調節，它可能是個可敬而大有希望的進展。

權利和自由這些工業社會發源和早期階段的關鍵因素，現在讓位於該社會的更高發展階段：它們正失去傳統的原則和內容。思想、言論及良心的自由——正如它們曾用來促進和捍衛的自由企業——曾經從根本上來說是批判性的思想，是用來以更具生產性和合理性的文化來取代逐漸被廢棄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的。一旦這些權利和自由制度化，它們便與自己成為其中一部分的社會共命運了。社會的那一驚人成就取消了這些前提。

在來源於需要，來源於完全自由的具體實體的自由正變成一種現實可能性這個程度上，與低生產力狀況相適應的解放，正逐漸失去它們從前的內容。思想的獨立性、自決性及政治對立的權利，在一個似乎日益能夠通過其組織起來的方式滿足個人需要的社會裏，正逐漸被剝奪了基本批判功能。這樣一個社

會可以公正地要求接受它的原則與制度，並把對立削弱為在現狀以內對不同政策的討論和促進。在這方面，日益增加的對需要之滿足是否由專制制度或非專制制度來實現，似乎無關緊要。在生活標準日益提高的條件下，對該制度本身的不滿顯得對社會無益，而在這種不滿產生了可感觸到的經濟政治損失，並威脅到這個整體的順利運轉時，情形更是這樣。的確，至少就生活必需品所及而言，似乎沒有理由認為，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及後勤服務應通過個人的競爭合作來進行。

從一開始，企業的自由就不全是一件幸事。作為工作或挨餓的自由，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它導致勞苦、不安及恐懼。如果個人不再被迫在市場上作為一個自由的經濟實體證明自己，那麼，這種自由的消失當是文明的最偉大成就之一。機械化和標準化的技術過程，可以把個人的能量釋放到一個超越了必然性的未知的自由王國。人類生存的這種結構將要加以變革；個人將從勞動界強加給他的稀奇古怪的需要和稀奇古怪的可能性中擺脫出來，個人將自由地發揮屬於他自己生活的自主性。如果生產手段能夠組織化並導致滿足生活需要，它的控制就可以充分地集中；這樣的控制將不會妨礙個人的自決權，反倒使它成為可能。

這是發達工業社會的一個目標，技術理性的“終點”。然而，實際情形是，反向趨勢佔上風：為了防禦和擴張，這一手段把它的經濟與政治要求強加給自由和勞動時間，強加給物質和精神文化。按照它組織其技術基礎的方式，當代工業社會趨向於成為一個極權主義者。因為“極權主義者”不僅是社會令人恐怖的政治調節，也是一種非恐怖的經濟技術調節，它靠既

得利益集團對需要的操縱而運轉。於是乎，它阻礙了對這一整體的有效對抗的產生。不僅獨特的政府形式或政黨原則促進極權主義，而且與政黨“多元主義”可以完全相容的特殊的生產和分配制度、報紙、對抗力量等等，都能夠起同樣的作用。^①

當今，政治力量通過它對機器過程和手段的技術組織的支配來表現自己。發達的和正在發展的工業社會的政府，只有在它成功地發動、組織和開發了工業文明可資應用的技術、科學及機械生產力時，才能維持和保全自己。而這種生產力，超越了任何特殊個人和集團利益，把社會作為一個整體調動起來。機器的物理（僅僅物理？）力量超過了任何個人或個人組成的集團，這一無情的事實，使得機器成了任何其基本組織乃是機器過程組織的社會之最有效的政治工具。但政治趨向可能倒轉；從根本上說，機器的力量只不過是貯存起來並規劃過的人的力量。在勞動界被設想為一台機器並相應地機械化這個程度上，它變成了人的新自由的潛在基礎。

當代工業文明證明，它已達到了這樣一個階段：這時，“自由社會”再也不能根據傳統的經濟、政治和精神自由來加以適當規定了，這不是因為這些自由已變得毫無意義，而是因為它們太有意義了。不能限定在傳統形式中，需要有新的現實化方式，以與新的社會能力相對應。

這樣的新方式只能用否定的術語來表明，因為它們相當於對流行方式的否定。於是，經濟自由就意味著從經濟中擺脫出來——從經濟力量和經濟關係的控制中擺脫出來；從日常生活

^① 見本書第 50 頁。

• 6 • 單面人

鬥爭中、從謀生糊口中擺脫出來。政治自由則意味著個人從他們無力控制的政治關係中解放出來。類似地，精神自由意味著對目前為面向大眾的信息傳播和灌輸所吞沒的個人思想的復歸，意味著“輿論”及其製造者的廢棄。這些主張的非現實主義調子所表明的，不是它們的烏托邦特徵，倒是阻礙它們實現的強大力量。反自由鬥爭的最有效和最持久形式，是輸入使過時的生存鬥爭形式永恒化的物質和精神需要。

人的超出生物學層次的需要的強度、滿足、甚至特徵，一般都是預先安排好了的。幹活、休假、享樂、破壞某物、擁有某物或拒絕某物的可能性是否作為一種需要來理解，取決於它能否看做是目前社會制度和利益所企求和所需要的。在這個意義上，人的需要是一種歷史的需要，而且，在社會要求個人的壓抑發展這個程度上，個人的需要本身和對滿足的要求都受到壓倒的批判標準的影響。

我們可以區分真的需要與假的需要。“假的”需要是這樣一些需要，它們是通過社會對個人的壓抑的特殊影響附加到他頭上去的：這種需要使得勞苦、侵略性、困境及非正義永恒存在。它們的滿足對個人來說也許是令人喜悅的，但是，如果這種幸福阻礙（他及其他）認識整體的疾病並抓住治癒它的機會之能力的發展，這就不是一個必須維護和保持的條件。於是乎，這一結果便是不幸中的一絲快慰。大多數對鬆弛、玩樂、按照廣告來表現與消費、愛憎他人所愛憎的需要都屬於這個假需要範圍。

這類需要有著社會內容與功能，這些內容與功能由超越了個人控制的外部力量決定；這些需要的滿足和發展受外界支配

。無論這類需要如何變成了個人需要，由個人的生存條件再產生和強化，無論個人怎樣把自由與它們統一起來，並發現自己追求它們的滿足，它們還是一開始那些東西——其佔統治地位的利益要求壓抑的社會傑作。

壓抑需要的盛行，是一個在無知和失敗中接受的真實事實，但這個事實必須根據幸福的個人以及所有以其痛苦作為其滿足的代價的人們的利益來解釋。無可懷疑，要求滿足的獨一無二的需要，是生命需要——在可獲得的文化水平上的食品、衣物及住房。滿足這些需要，乃是實現所有需要，包括非升華的與升華的需要的先決條件。

對於任何意識和良心，對於任何未把目前的社會利益作為思想和行為最高準則來接受的經驗，既定需要和滿足域是一個應當加以質疑——按照真與假來質疑——的事實。

真和假這些用語完全是歷史的，它們的客觀性也是歷史的。在特定條件下，對需要與滿足的判斷涉及到優先性標準——這些標準與在可資利用的物質和精神資源的最佳利用下，個人及所有個人的最優發展有關。資源是可計算的。在生命需要的普遍滿足及超出這種滿足的勞苦與貧困的緩和是普遍合理的標準這個意義上，需要的“真”與“假”反映了客觀狀況。但作為歷史的標準，它們的確不僅因地區和發展階段而變化，而且也只能根據它們（或多或少）與目前需要的矛盾來加以規定。什麼法庭才有可能贏得決定性的權威呢？

歸根結底，什麼是真需要和什麼是假需要的問題必須由個人自己來回答，但也只能是在最終的意義上這麼說，即只有在

他們有給出自己答案的自由的時候才能這麼說。只要他們仍然不能自主，只要他們被灌輸，被控制（直達於他們的本能），他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就不能算作是他們自己的。然而，據此看來，沒有任何法庭可以公正地把決定哪些需要應當發展和滿足的權利歸為已有。任何這類法庭都應受到譴責，雖然我們的嫌惡不能擺脫這個問題：那些自己便是所實施的有效和生產性支配的對象的人們，怎樣才能創造出自由的條件呢？①

社會的壓抑管制變得越是合理，越具生產性，越有技術性和總體性，受管制個人可以據之打破他們的奴役，並把握住自己自由的手段和方式就越是不可想像。確實，把理智強加於社會，是一個自相矛盾和令人反感的想法——雖然有人可能會對一個在使自己的下民成為總體管制對象的同時，嘲弄這一想法的社會的正義提出質疑。所有的自由取決於對奴役的意識，而這種意識的產生，總是受到在很大程度上已變成了個人自己的需要和滿足的阻礙。這個過程總是取代了一個以另一制度為前提的制度；最優的目標是，用真需要取代假需要，拋棄壓抑的滿足。

工業社會的突出特徵，便是它有效地窒息了那些要求自由——也包括從可以容忍的有價值的和令人舒適的滿足中擺脫出來——的需要，而同時又容忍並赦免了富裕社會的破壞力和壓抑作用。在此，社會控制的急需是廢物的生產和消費的必要；急需不再是一個現實必然性的使人麻木不仁的工作的必要；而是使這種麻木不仁被忘却和延長的鬆弛方式的必要；急需把諸

如以支配為代價的自由競爭、自我審查的自由出版以及在商品品種與小玩藝兒之間的自由選擇之類的欺騙性自由維持下去。

在一個壓抑整體的統治下，自由能夠轉變成一種有力的統治手段。向個人開放的選擇範圍，在決定人的自由程度中並非決定性因素，起決定作用的是個人能夠選擇什麼及究竟選擇了什麼。自由選擇的標準決不可能是絕對的，但也不完全是相對的。對主人的自由選擇並不取消主人或奴隸。在極其多樣的產品和後勤服務中進行自由選擇並不意味著自由，如果這些產品和服務支持對勞苦和恐懼生活之社會控制的話——也就是說，如果它們支持異化的話。而且，個人所進行的附加需要自發再生產並不確立自主性，它僅僅證明了這些控制的有效性。

我們對這些控制的有效性及深度的強調易於受到這樣的反對，我們過高估計了“宣傳工具”的灌輸力，而人們會自己感覺到現在強加於他們的需要並滿足之。這種反對漏掉了最重要的東西。預處理並不始於收音機和電視機的大批量生產及對它們的集中控制。人們作為預處理過的長久貯藏所進入這一階段，決定性差別在於特定需要與可能需要、滿足的需要與未滿足的需要之間對比的抹平。在此，所謂階級差別的調整暴露了它的意識形態功能。如果工人和老板欣賞同樣的電視節目，遊覽同樣的娛樂場所，如果打字員與她僱主的女兒打扮得一樣漂亮，如果黑人擁有卡德拉牌小汽車，如果他們讀相同的報紙，那麼，這種同化並不表明階級的消失，而只是表明了用來維護現存制度的需要和滿足由下層人民分享的程度。

的確，在當代社會最高度發達的地區，社會需要向個人需

① 見本書第 41 頁。

要的移植極其有效，它們之間的差別似乎只是純粹理論性的。人們真的能把作為信息和娛樂手段的宣傳工具與作為控制和灌輸力量的宣傳工具區分開來嗎？真的能把作為討厭事物的汽車與作為方便工具的汽車區分開來嗎？真的能把對功能建築的欣賞與嫌惡區分開來嗎？真的能把為著國家防禦而進行的工作與為公司謀利而從事的工作區分開來嗎？真的能把個人快樂與增加出生率所涉及的商業和政治功利區分開來嗎？

我們再次面對發達工業文明最令人煩惱的一個方面：反理性的理性特徵。它的生產力和效率，它的增加和擴展愉悅、變廢為需、變破壞為建設的能力，以及把客觀世界轉變為人類精神和軀體的領地的程度，都使得異化概念值得懷疑。人們在他們的產品中認識了自己，他們在汽車中，在高保真收錄機中，在錯層式居室及廚房設施中發現了自己的靈魂。那個把個人繫到社會上去的機制已經變了，社會控制在它所產生的新需要中固定下來。

在某種新的意義上，目前的社會控制形式是技術的。確實，生產性和破壞性手段的技術結構和效率，已成為在整個現代時期把人們附屬於既定社會勞動分工的一個主要手段。而且，這樣的整合總是伴隨著更明顯的強制形式：生計的喪失、正義的管制、警察和武裝力量。現在仍然如此。但在當代，技術控制顯得就是為社會所有集團和所有利益的理智的體現——在所有矛盾似乎都是反理性的，而所有反作用似乎都是不可能的這種程度上。

那麼，無論如何，在這一文明的最發達地區，社會控制已

被攝取到了甚至個人的抗議都從根本上受到影響的程度。對“前進”的明智而充滿激情的拒斥倒顯得神經過敏且軟弱無力。這就是標誌著進到了當代的政治事件——在工業社會初始階段似乎是代表了新的生存形式的可能性之歷史力量的衰微——的社會心理方面。

但“攝取”(introduction)一詞，也許不再描述個人單獨再生產出他的社會所行使的外部控制並使之永恒存在的方式。攝取揭示了各種各樣相對自發過程，通過這些過程，自我把“外在物”轉化為“內在物”。這樣，攝取就啓示了與外部迫切需要區別開來的甚至敵對的內在方面的存在——與輿論和社會行為分離的個人意識與無意識。^① “內在自由”的思想在此獲得了現實性，它表示私人空間，其中人們可以變成並保全“自我”。

當今，這個私人空間已遭到技術現實的侵犯與損害。大批量的生產和分配要求獲得完整的個體，而工業心理學老早以前就不再局限於工廠。五花八門的攝取過程，似乎被以近乎機械的反應固定下來。其結果，不是調節而是模仿：人與他的社會直接同一，並通過它與整個社會同一。

這種直接的無意識的同一（可能有原始聯合形式的特徵）在高度工業化文明中再現；然而，它那新的“即時性”乃是嚴密而科學的管理和組織的產物。在這個過程中，與現狀的對立

^① 家庭功能的變化在此起著決定性作用，它的“社會化”功能正日益為外部集團和媒介取而代之。見我的《愛欲與文明》（波士頓燈塔出版社，1955年版），第96頁以下。

可以在植根其中的精神“內在”方面受到削弱。在精神的這一內在方面，思想的否定力量——理智的批判力——感到安閒自在，無拘無束，這一面的喪失不過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對應物，與發達工業社會平息和調和對抗的物質過程相適應。進步的影響使理智屈服於生活事實，屈服於產生更多更重大的同種生活事實的動力學能力。該制度的有效性鈍化了個人的這種認識：該制度不包容不傳遞該整體壓抑力的事實。如果個人發覺自己正處在塑造了他們生活的事物中，他們就會這樣做，不過不是通過給出，而是通過接受事物的法則——不是物理學的規律，而是他們社會的法則。

我剛才已經揭示出，當個人與強加在他們身上、並出現於他們自己的發展和滿足中的存在同一時，異化概念似乎變得可疑起來。這種同一不是幻覺而是現實。然而，現實構成了異化的一個更為進步的階段。後者已變成完全客觀的了；異化的主體為它異化了的存在所吞沒。只有一面，它無所不在，形式多樣。進步的成就使得意識形態的控訴和證明化為泡影；在它們的法庭上，它們理性的“假意識”變成了真意識。

然而，現實對意識形態的同化並沒有預示“意識形態的終結”。相反，在某個特殊意義上，由於當今意識形態處於生產過程本身之中，發達工業社會比它的前身更意識形態化。^①以一種挑動性的形式，這個命題揭示了當前技術理性的政治方面。生產手段及其生產出來的產品和服務，“賣出”或強化了這

^① 阿多諾：《三棱鏡：文化批判與社會》法蘭克福瑟坎普公司1955年版，第24—25頁。

個作為整體的社會系統。大眾交通與傳播工具、吃穿住日用品，具有非凡魅力的娛樂與信息工業輸出，這些也同時帶來了人為規定的態度、習俗以及以多少舒適的方式使消費者與生產者結合並通過後者與整個社會結合起來的某些理智與激情反應。這些產品灌輸、控制並促進一種虛假意識，這種意識不因自己虛假而受影響。而且，隨著這些有益產品對更多社會階層的個人變為可得之物，它們所攜帶的訓誡就不再是宣傳而是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它是一種美好的生活方式——比從前的要美好得多，而且，作為一種美好的生活方式，它抗拒質變。一種單面思想與單面行為模式就這樣誕生了。在這種模式中，觀念、志向以及就其內容來說超越了既定論說與行動域（the established universe of discourse and action）的目標，都被迫返歸或還原為該域的術語。它們由這個特定系統及其量的延伸的理性來重新加以規定。

這一傾向可以與科學方法中的進展——物理學中的操作主義和社會科學中的行為主義關聯起來。它們的共同特徵就是概念處理上的總體經驗論；它們的內涵僅限於特殊操作與行為的表達。操作主義觀點由布里奇曼對長度概念的分析闡述得一清二楚：^①

^① 布里奇曼的《現代物理學的邏輯》，紐約麥克米倫公司1928年版，第5頁。操作主義學說自那時起被修正和完善了。布里奇曼本人就把“操作”概念擴展到了理論家的“紙—筆”操作（見弗蘭克《科學理論合乎邏輯的證明》，波士頓燈塔出版社1954年版，第二章）。主要的推動力

如果我們能夠說明任何物體和每一物體的長度是什麼，就可明白地指出我們說長度時指的是什麼，而對物理學家來說，所要求的也僅此而已。為要找出一物體的長度，我們必須進行某些操作。因此，當長度據以測量的操作固定了時，長度概念也就固定了：也就是說，長度概念僅與長度據以確定的操作集合有關。一般地，我們說任何概念時所意指的也僅是一個操作集合而已，概念完全是對應操作集合的同義語。

布里奇曼已看到了這一思維方式對一般社會的廣泛意義：^②

接受操作觀點所涉及的，遠不止一個對我們於其中理解“概念”之意義的純粹限制，而且意味著我們思維習慣中的一個深刻變化，因為我們不再允許自己在思維中，把我們不能用操作術語給以適當說明的概念作為工具來運用。

布里奇曼的預言已成為現實。今天，新的思維方式已成為哲學、心理學、社會學以及其他領域中的主導趨勢。許多最困惑人的概念，就是通過表明不能用操作術語對它們作出適當說明而正被逐漸排除出去。激進的經驗主義突然襲擊（我將在隨後的

依然如故，這是所期望的：紙 - 筆操作最終是能夠與儀器操作相聯繫的，儘管這種聯繫也許是間接的。

^② 布里奇曼：《現代物理學的邏輯》，第 31 頁。

第七、八章考察其斷言是否是經驗主義的），就這樣為知識份子敗壞心智——一種實證主義，它在否認理智中的超越因素時形成了社會所要求行為的學術對應物——提供了方法論證明。

在學術機構以外，我們整個思維習慣中的“深刻”變化更為嚴重。它用來把概念、目標與當前制度所急需的東西協調起來，把它們封閉於該制度中，排斥那些與該制度不協調的思想、觀念及目標。這樣一個單面現實的統治，並不意味著唯物主義的統治，也不意味著靈魂的、形而上學的以及放蕩主義的佔領正在消亡。相反，倒有大量諸如“這個星期全禮拜”、“為什麼不試試上帝”以及禪宗、存在主義及頽廢生活方式之類的東西存在。但這類抗議與超越方式不再與現狀衝突，也不再是否定性的了。它們是實踐中的行為主義的正式組成部分，也是對這種行為主義的無害否定，並迅速地被現狀作為它健康飲食的一部分而消化掉。

單面思想是由政策制訂者及他們的大眾信息籌辦員們系統地促成的。他們的論域為自明的假說充斥著，這些假說經過不停而獨佔性的重覆，變成了催眠性的規定或命令。例如，那些在自由世界國家中運轉（和被操縱）的制度是“自由的”，其他超越的自由模式，按規定要麼是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要麼是宣傳。“社會主義的”全都是不由私人企業本身（或通過政府合同）從事的對私人企業的侵犯，諸如普遍綜合的衛生保健，或保護自然免受過於廣泛的商品化影響，或可能損害私人利益的公用事業機構等等。既成事實的這種極權主義邏輯有它東方的對應者。在那裏，自由是共產主義政權制定的生活方式

，而其他所有超越的自由模式，要麼是資本主義的或修正主義的，要麼是左傾宗派主義的。在兩大陣營中，非操作的觀念都是非行為的和破壞性的。思維活動止於作為理智本身限度出現的障礙。

這種思想限制肯定不是新的。上升的現代理性主義以其辯及經驗形式表明，在科學和哲學這一面的極端批判激進主義與對既定的和正發揮作用的社會制度的態度那一面非批判的無為主義之間，存在著鮮明對比。這樣，笛卡兒的我思便著意留下了“偉大國家”未被觸及，而霍布斯堅持認為，“現狀總應當受偏愛、維護和最好的證明”。如果革命成功地把這個整體組織起來並阻止了毀滅時，康德也贊同洛克對革命合理性的證明。

然而，這些親切的理智概念總是與明擺著的苦難以及“偉大國家”的非正義格格不入，也總與有效地、或多或少是有意識地對它們（概念）的背叛格格不入。引發和放任與既定事態的真實離異的社會條件存在，一個離異可於其中發展為有效的對抗、檢驗其力量和目標的合理性的私人政治面便存在。

隨著這一面為社會逐漸封閉，思想的自我限制便僭取了更大意義。科學哲學過程與社會過程間、理論理智與實踐理智間的相互關係，在科學家與哲學家的“背後”表現出來。這個社會反對一整套的對立操作與行為；其結果，隸屬於這些操作與行為的概念便被描寫為虛幻和沒有意義的。歷史的超越作為形而上學的超越而出現，對科學和科學思想來說是不可及的。作為一個一般“思維習慣”的操作和行為觀點，變成了既定論說與行動、需要與志向域的觀點。像它經常如此所幹的那樣，

“理智的機巧”按照當局的利益工作。對操作與行為概念的堅持，與那些為受壓抑替換而使思想和行為從特定現實中擺脫出來的努力相抗衡。理論理智與實踐理智、學術行為主義與社會行為主義相遇於共同基礎，使科學和技術進步成了統治手段的發達社會的基礎。

“進步”不是個中性詞；它向科學的目標前進，而這些目標是由改善人類狀況的可能性來規定的。發達工業社會正接近於這樣一個階段，其時，延續的進步要求激烈扭轉和推翻現行進步方向和組織。當物質生產（包括必要的後勤服務）在所有生活需要都已能滿足，而必要勞動時間被縮短到最低限度這個程度上實現了自動化時，這個階段便到來了。從此以後，技術進步將超越必然王國（在必然王國裏，技術進步用作統治與剝削的手段，而這就限制了它的合理性）；技術將變得易受人類能力在為自然與社會和平共處而進行的鬥爭中的自由運用影響。

馬克思在他的“勞動的廢除”概念中展望過這樣的狀態。“生存緩和”（pacification of existence）一詞似乎更適於表示世界的歷史替代，這種替代——通過使既定社會內部的矛盾轉為所擋置的國際衝突——在全球戰爭的邊沿上推進。“生存緩和”意味著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的鬥爭的發展，它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進行的：競爭的需要、願望以志向，不再為少數佔統治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團——也就是使上述鬥爭的破壞性形式永恒存在的組織——所操縱。

今天，反對這一歷史替代的鬥爭在下層人民中找到了堅實的群眾基礎，並在思想和行為對特定事實域的堅定取向中找到了它的意識形態。科學技術成就及日益提高的生產力都證明了

現實的合理性，因而它使得一切超越成為泡影。面對建立在技術和知識進步基礎上的緩和可能性，成熟的工業社會使自己封閉起來，與這種替代隔絕。理論與實踐中的操作主義變成了包容的理論與實踐。在它明顯呈動態的外表下，該社會是一個完全靜止的生活系統：在其壓抑的生產力和有益的調整中自我推進。技術進步的包容與既定方向上的增長攜手共進。儘管有現實所加上來的政治羈絆，技術顯得能創造出的緩和條件越多，人的精神和肉體就越被變本加厲地控制起來，以對抗這種替代。

工業社會最發達地區四處展現出這兩個特徵：走向技術理性的圓滿趨向和把這一趨向包容於既定制度以內的巨大努力。這裏有一個該文明的內在矛盾：理性中的反理性因素。這是它進步的標誌。把科學技術佔為己有的工業社會被組織起來，爲的是要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爲有效地支配人和自然，爲的是要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爲有效地利用它的資源。當這些努力的成功開闢了人的現實化的新維度時，該社會就變得反理性了。和平組織不同於戰時組織；服務於生存鬥爭的制度不能服務於生存的緩和。作爲目的的生活在質上不同於作爲手段的生活。

這樣一種新質的生存方式，決不能被設想爲純粹經濟和政治變化的副產品，決不能被設想爲構成必要前提的新制度多少自發的結果。質變也涉及到一個該社會建於其上的技術基礎中的變化——這個變化容忍了作爲控制的攻擊性對象的人的“第二自然”據以穩定下來的經濟與政治制度。工業化的手段就是政治手段；按本來面目，它們對理智與自由的可能性抱有成見。

確實，勞動必須先於勞動的減輕，而工業化必須先於人的需要和滿足的發展。但由於所有自由依賴於對陌生必然性的征

服，自由的實現就依賴於這種征服的手段。最高的勞動生產率能夠用來使勞動永恒存在，而最有效的工業化能夠服務於對需要的限制和操縱。

當這一時刻到來的時候，統治——以富足與自由的名義——擴展到了全部個人與社會生存領域，把所有真正的對立整合起來，同化一切替代。當技術理性變成更好的統治和創造一個真正極權主義世界（在這個世界裏，爲著捍衛這個世界的目的，社會和自然、精神和肉體都被保持在一種永恒的動員狀態）的名符其實的工具時，它暴露了自己的政治特性。

第二章 封閉中的政治域

在工業文明的最發達地區形成的總動員社會，在生產聯合中把福利國家與戰時狀態國家的特徵結合起來。與其前身相比，它的確是一個“新社會”。傳統的騷亂點正被清除或孤立，混亂因素受到控制。主要趨向相似：作為刺激、支持有時甚至是控制力量的政府，按照大公司的需要把國家經濟集中起來；把這一經濟納入一個世界範圍的軍事聯合、財政統籌、技術協作和發展規劃的系統，使藍領和白領人群同化，使公司與勞工領導人物同化，使不同社會階層的餘暇活動和志向同化，促進學術成就與國家意願間的前定和諧，通過輿論的家庭聚會侵蝕私人事務，使臥室向大眾信息傳播媒介開放。

在政治領域，這種趨向在對立面的明顯同一或統一中表現出來。外交政策中的兩黨支持在國際共產主義的威脅下，超出了競爭集團的利益，並擴展到了國內政策，在此，各大政黨的綱領比從前任何時候都難分辯，連偽善程度和老生常談的調子都是如此。這種對立面的統一，影響到了這樣一種社會變化的可能性，這種社會變化把該系統踏在其背上前進的那些階層包括進來——也就是說，把那些其存在一度體現了與作為整體的該社會相對立的階層包括了進來。

在美國，有人注意到公司與組織起來的勞工間的結合與聯

盟；民主制度研究中心 1963 年出版的《工人看勞動，一次談話》中，告訴我們：

已發生的情況是，工會在它自己眼中都變得與企業區分不開。今天，我們看到了工會與企業聯合進行院外活動的現象。當工會與企業都出去為更大的導彈合同進行遊說，並竭力把其他國防工業納入本地區時，或者當他們聯合出現在國會面前，並根據他們所訂合同而共同要求製造導彈而不是炸彈或要求製造炸彈而不是導彈時，工會就不會願意使導彈工人相信，他們為之工作的公司是一班可鄙的傢伙。

其領導人在促進國家利益方面與其保守黨對手競爭的工黨，甚至很難挽救部分國有化的樸素綱領。在共產黨遭取締的西德，公開拒絕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正令人信服地贏得人們的尊重。這是西方主導工業國家的情況。在東方，直接政治控制的逐漸削弱，也證實了對作為統治工具的技術控制的有效性的信賴日增。至於強大的法國和義大利共產黨，也同樣證明了這個一般趨向，支持一個最低綱領，這個綱領把用革命手段奪取權力一事擋置起來，並信守議會運動的教條。

然而，雖然在外國勢力支持這個意義上認為法國和義大利黨是外國的說法是錯的，但在這種宣傳——它們是目前現實中過去（或未來？）歷史的見證人，因而它們是外國的——中却有一個並非故意的真理內核。如果它們已經同意在既定制度的框架內運轉，那不是純粹出於策略考慮，也不是作為短期戰略

，而是因為它們的社會基礎已受到削弱，它們的目標也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轉變而發生了變化（就像已承認了這種政策變化的蘇聯，其目標已發生了變化一樣）。這些國家的共產黨，起到了被指責為“非激進的”合法對立黨派的歷史作用。它們證實了資本主義整合的範圍和深度，也證實了使得相互矛盾利益的質的差別作為既定社會內部量的差別出現的條件。

為了找出這些發展的因由，深層分析似乎並不必要。對於西方，社會內部從前的衝突，在技術進步和國際共產主義的雙重影響下，已受到修正並訴諸公斷。在外來威脅面前，階級鬥爭淡化了，“帝國主義的矛盾”也被懸置起來。為抗拒這種威脅而動員起來的資本主義社會，已顯示了先前工業化階段聞所未聞的內部聯合與團結。它是一個物質基礎上的團結，為反對敵人而進行的動員，作為對生產和僱工的強大刺激而起作用，這樣就維持了高生活標準。

在這些基礎上，一個管制域產生了。在該域中，由於日益增長的生產率及令人恐怖的核戰爭的有利影響，不景氣受到控制，衝突被平息下來。在它並未影響到馬克思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發現的不和諧（生產資料私人佔有與社會化生產率之間的矛盾）的根源這個意義上，這種緩和是暫時的嗎？或者說，通過使其容忍來解決這些矛盾，就是這種對立結構本身的轉化嗎？而且，如果第二個替代是正確的，那它又如何改變那使得社會主義顯得就是資本主義的歷史否定的兩大陣營間的關係呢？

社會變化的包容

經典馬克思主義把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設想為一場政治革命：無產階級摧毀資本主義的政治工具，但保留其技術手段，並使之社會化。在這場革命中有連續性存在：擺脫了反理性限制和破壞的技術理性，在新的社會中維持下來並使自己圓滿。讀一讀蘇聯馬克思主義者對這種連續性——它對社會主義概念的極端重要性與對資本主義的明確否定相同——的論述是很有趣的：①

(1) 雖然技術的發展受到每個社會形態的經濟規律制約，但不像其他經濟因素，它不隨這一形態的規律的休止而終結。當革命過程中舊的生產關係被打破時，技術却保留了下來，並服從於新經濟形態的經濟規律，繼續以加快了的速度發展下去。(2) 與對立社會中經濟基礎的發展相反，技術發展不是跳躍式的，而是通過舊質因素消亡的同時新質因素的逐步積累而實現的。(3) (與此處的情景無關)。

在發達資本主義中，技術理性儘管有反理性的應用，還是體現在生產手段中。這不僅適用於機械化工廠、工具、資源開發，

① 茲渥里金：《作為科學與技術分支的技術史：蘇聯的觀點》，見《技術與文化》，底特律韋恩州立大學出版社，1961年秋季版，第2頁。

也適用於作為適應的勞動方式，適用於由“科學的管理”安排的對機器過程的控制。國有化或社會化本身都不改變技術理性的這種物理體現；相反，後者依然是社會主義所有生產力發展的前提條件。

確實，馬克思堅持認為，“直接生產者”對生產資料的組織和支配，將在技術連續性中導入一種質變：即為滿足個人自由發展需要而生產。然而，在既定技術手段把社會生存與個人生存捲入社會全部領域——即變成了把勞動階級結合起來的政治域的控制與集聚媒介——這個程度上，這一質變將涉及到技術結構本身的變化。而且，這樣的變化以勞動階級與他們的生存域相離異為前提，以他們的意識就是對他們在該域中繼續存在下去的總體不可能性的意識為前提，因而，對質變的需要就是個生死攸關的重大問題。於是乎，否定先於變化本身而存在，正在爭取解放的歷史力量在既定社會的內部發展的觀念則是馬克思理論的基石。^①

現在，正是這種新的意識，這種“內空間”（space within），這種為超越歷史實踐服務的空間，受到了社會的阻礙。在這個社會裏，主體與客體構成了在壓倒的生產率的現實化中有自己存在理由的整體之工具。它的大前提，是為日益增長的、在嚴格意義上不能想像一個質上不同的論說與行動域的人們提供日趨舒適的生活，因為包容與控制破壞性設想和努力的能力，乃是這個特定社會整體的一部分。那些其生活是富裕社會的地獄的人們，所受的非人待遇再現了中世紀與近代早

^① 見本書第 42 頁。

期的實況。對另一些更少特權的人們來說，社會通過滿足那些使奴役更愜意甚至更不惹人注目的需要來消除對自由的需要，而且，它在生產過程自身中實現了這件事。在這一過程的影響下，工業文明中最發達地區的勞動階級正發生著決定性的轉變，這一轉變已成了大量的社會學研究的課題。我將在此列出這種決定性轉變中的主要因素：

(1) 機械化正日益減少著花費在勞動中的體力的量和強度。這一發展對馬克思的工人（無產者）概念有巨大影響。對馬克思來說，無產者基本上是體力勞動者，他們在勞動過程中付出並耗盡體力，哪怕他們用機器工作也是如此。私人為獲得剩餘價值而在非人條件下購買和使用這種體力，產生了剝削這令人噁心的野蠻一面；馬克思的學說斥責勞動的悲慘與痛苦——這是工資奴役與異化中物質的、可見的部分，是古典資本主義的生理與生物方面：

在過去數世紀間，異化的一個重要理由是人把他的生物個性出賣給技術工具：他是工具的載體；不把人結合到其中去，技術單元無以確立。這一佔有的本質便如此這般地，在後果上造成了心理和生理兩方面的扭曲。^①

現在，發達資本主義在維持剝削的同時，對勞動的機械化

^① 吉爾伯特·西蒙登：《論技術客體的存在方式》，巴黎奧比爾公司，1958 版，第 103 頁注。

日益完善，這就改善了被剝削者的態度與地位。在技術總體內，其中自動化與半自動化反應填補了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的話）勞動時間的機械化勞動保留了下來，作為一生的佔有，作為使人精疲力竭和愚化的野蠻奴役——由於速度加快，甚至使人更加精疲力竭，作為對機器操作者（而不是產品）的控制，作為使工人相互孤立的手段。^①確實，這種單調辛苦的勞動形式，表現了受阻礙的、不徹底的自動化，表現了同一工廠內自動化、半自動化及非自動化成分的共存，但甚至在這些條件下，“技術已用緊張或精神努力替代了肌體勞累。”^②對更先進的自動化工廠來說，更加強調把體力轉化為技術與精神（知識）技能：

……頭腦而不是手的技能；邏輯學家而不是名匠的技能；神經而不是肌肉的技能；舵手而不是操作工的技能；維護者而不是操作者的技能。^③

這種巧妙的奴役與對打字員、銀行出納員、急迫的男女售貨員及電視播音員等的奴役並沒有根本的不同。標準化與程序化同化了生產性與非生產性勞動。資本主義早期階段的無產階級的

① 見查理斯·田貝：《工人與自動化鬥爭》，載《新聞與通信》，底特律 1960 年出版。

② 查理斯·沃克：《邁向自動化工廠》，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1957 年版，第 XIX 頁。

③ 同上，第 195 頁。

確是身負重載的牛馬，靠他軀體的勞動來換取生活必需品與消費品，因而生活在污穢與貧困中。他就這樣成了他那個社會的活生生的否定。^①相形之下，技術社會發達地區的組織起來的工人對這種否定的表現就沒那麼明顯，而且，如這種勞動社會分工中的其他人的客體一樣，他被結合到受管制人們的技術共同體中。此外，在自動化最成功的地區，某種技術共同體似乎把勞動中的個人（human atoms）整合起來。機器似乎正慢慢地向操作者灌輸著使人昏昏然的音符：

人們普遍承認，由一群人完成，按一和諧方式進行的相互依存的活動產生了滿足——這種滿足完全與這些活動所實現的東西無關；^②

而且，這位社會觀察家（指查理斯·沃克——譯者注）相信，這就是“對生產和某些人的滿足更有利的”“一般氣候”逐步形成的一個原因。他談到了“每個班組中強烈的內部集團感情的增長”，並引用了一位工人的話作證：“我們完全處於事物的支配之中……”^③這句話恰當地表達了機械化奴役中的變化

① 人們必須堅持馬克思的剝削與貧困概念的內在聯繫，儘管後來對這些作了重新規定，使得“貧困”或者成了文化方面的，或者是相對於這樣一個程度——那就是擁有汽車、電視等的居住在郊區的家庭——上說的。“貧困”暗示了摧毀難以忍受之生存條件的絕對必需與必要，而這種絕對需要出現於所有反對基本社會制度的革命的開始。

② 查理斯·沃克，同 26 頁注，第 104 頁。

③ 同上，第 104—105 頁。

：事物支配而不是壓迫，它們支配著人身上的全部手段工具——不僅是肉體，而且還有精神甚至靈魂。薩特的論述詳盡地闡明了這一過程的深度：

半自動化機器引進後不久，調查表明，技術熟練的女性工人只好承認自己敗下陣來且產生了性別幻想，她們想起了臥室、床鋪、夜晚及所有只與夫妻幽居有關的東西。但在她們心中，渴望愛撫的正是機器…
…①

技術領域的機器過程，打破了自由的最深層秘密，在一個有規律循環的無意識行爲中把性與勞動結合在一起——一個與勞動的同化相平行的過程。

(2) 同化趨向也表現在職業分層作用 (occupational stratification) 過程中。在關鍵性工業機構中，與“白領”成分相關聯的，是“藍領”勞動力量減弱；非生產性工人數量增加。②這—量變使人們注意到基本生產工具特徵的變化。

① 薩特：《辯證理性批判》，第1卷，巴黎柯利馬出版公司1960年版，第290頁。

② 《自動化與重大技術變革對工會規模、結構及功能的影響》美國勞聯—產聯工業工會部編，華盛頓，1958年版，第5頁以下。所羅門·巴爾金：《勞工運動的衰落》聖巴拉民主制度研究中心，1961年版，第10頁以下。

①在發達的機械化階段，作為技術現實的組成部分，機器不是

一個絕對統一體，而僅僅是一個在兩個方向上開放的個性化技術現實，這兩個方向，一個與組成有關，一個與該技術整體中個人間的關係有關。②

在機器自身變成了一個機械工具與關係的系統，並因而遠遠超出了個人的勞動過程這個程度上，通過減少勞動者的職業自主權，並把他整合到受控但又控制技術總體的其他職業中，機器表現了更大的支配作用。確實，勞動者從前的“職業”自主性不過是對他的職業奴役。但這種獨特的奴役方式，同時又是他獨特的職業否定力量——中止以滅絕威脅著他作為人而存在的過程的力量——的來源。現在，勞動者正失去職業自主性——這會使他成為一個與其他職業人群區分開來的階層之成員——這種職業自主性體現了對既定社會的否證。

技術變化趨於消除作為個人生產工具、作為“絕對單元”的機器，這就似乎取消了馬克思的“資本有機構成”概念以及與這一概念相伴隨的剩餘價值理論。在馬克思看來，機器根本不創造價值，而只是把它自身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剩餘價值依然是剝削活勞動的結果。機器是人的勞動力的體現，通過它，過去的勞動（物勞動）保存了下來並決定了活勞動。現在，自動化似乎從本質上改變了物勞動與活勞動的關係，它正走向

① 見本書第24頁。

② 吉爾伯特·西蒙登：《論技術客體的存在方式》第146頁。

這樣一個時刻，其時，生產率“由機器而不是由個人的輸出”決定。①而且，個人的輸出的度量也變得不可能：

在最高意義上，自動化在效果上意味著勞動度量的終結……隨著自動化的到來，你不能度量單個人的輸出，你現在只得度量設備利用情況。如果這被概括為一種概念……就完全不再有理由實行“計件付酬或計時付酬”了，也就是說，從今以後，再無理由實行二重付酬制了。②

這一報導的作者丹尼爾·貝爾進一步深入，他把這種技術變革與工業化自身的歷史制度聯繫起來：工業化的意義並不隨工廠的引入而產生，它

來源於勞動的度量。正是在勞動能度量的時候，正是在你能夠於他身上套上挽具、按單件度量他的輸出並計件或計時給他付酬的時候，你已完成了近代工業化
③。

① 瑟奇·馬利特語，《文摘》第12—13期，巴黎，1958年，第18頁。

② 《自動化與重大技術變革對工會規模、結構及功能的影響》，第18頁。

③ 同上。

在這些技術變遷中，要緊的遠不止付酬制度或工人與其他階層的關係及勞動組織，要緊的是技術進步與工業化於其中完成的制度之間的相容性。

(3) 勞動與生產工具特徵中的這些變化，改變了勞動者的態度與意識，這種態度與意識，在廣泛討論過的勞動階級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文化整合中變得明顯起來。這僅僅是意識的變化嗎？經常由馬克思主義者給出的肯定回答似乎奇怪地不合邏輯。意識中的這樣一個根本性變化，不設想“社會存在”中的相應變化可以理解嗎？即使承認意識形態的高度獨立性，把這一變化連接到生產過程的變化上去的聯繫也與這種解釋相衝突。需要和志向、生活標準、業餘活動、政治傾向等等領域中的同化，產生於工廠自身中及生產過程中的整合。除了在諷刺意義以外，能否說得上“自願整合”（瑟奇·馬利特語）實在可疑。在目前形勢下，自動化的否定特徵佔統治地位：高速化、技術失業、管理地位的強化、工人作用的日益下降與讓渡。在管理中越來越偏愛工程師和大學畢業生，加薪的機會減少了。①然而，還有其他趨向。有利於運轉中的機械共同體的相同技術組織，也產生了把工人與工廠整合起來的相互依賴性。②人們注意到工人們表現了“共同解決生產問題”的“熱情”，

① 查理斯·沃克：同26頁注②，第97頁以下。在伊利·奇諾伊的《汽車工人與美國夢》（加登城道布爾迪公司，1955年版）一書中到處可見。

② 弗洛伊德·曼和理查德·霍夫曼：《自動化與工人：發電廠的社會變遷研究》，紐約亨利·霍爾特公司1960年版，第189頁。

表現了“主動加入進來把他們自己的智慧應用到與技術相適應的生產和技術問題中去的願望。”^①在某些技術最先進的機構中，工人們甚至炫耀他們自己在這個機構中的既得利益——資本主義企業中頻頻可見的“工人入股”的一個後果。有一段引人入勝的描述是講法國安貝斯那高度美國化的德士古煉油廠的，它可以用來說明這一趨向。這家工廠的工人們意識到把他們歸屬到這個企業的聯繫：

職業的、社會的、物質的聯繫：他們在這家煉油廠獲得的技能，他們已習慣於某些在那裏建立起來的生產關係的事實；各種各樣的社會福利，他們在萬一碰到突然死亡、嚴重疾患、喪失工作能力、最後是衰老這些情況時可以依賴它們。純粹是因為他們屬於這家公司，就把他們的保險擴展到了超過他們生命的生產時期。這樣，與德士古的有生命力的、堅不可摧的合同這一觀念，使他們以意想不到的關心和洞察力考慮該公司的金融管理。“企業委員會”的代表們以認真的股東們願意付出的熱情審查和討論該公司的報告。當工會因為新投資的需要而同意撤回它們的加工資要求時，德士古的董事會肯定高興得直握手。但當代表們拿到法國分部的長長負債單，並對這些分部算出來的不利數額擔憂的時候，他們却開始表現出‘合理焦急’的跡象，並大膽地爭論生產成本，且提出節約

^① 查理斯·沃克：同 26 頁注^②，第 213—214 頁。

資金的措施。^①

(4) 新的技術勞動界就這樣加強了對勞動階級否定地位的削弱，後者不再表現為現存社會活生生的對立。這一趨向受到生產從另一方面，即管理與指導方面的技術組織後果的強化。統治被美化為管理。^②資本主義老板和貨主正逐漸失去作為責任代表的身份：他們正逐漸在一臺自治機器上發揮著官僚的作用。在這個巨大的遠遠超出私人企業、達於科學實驗室和研究所、國民政府和國家意願的執行與管理單元等級體內，剝削的有形來源，在客觀合理性的外表下消失了。^③隨著作為其手段的技術進步的推進，不自由——在人被束縛於他的生產工具這個意義上說——以許多自由且舒適的形式被永恒化和強化了。新的特徵是這項反理性事業中壓倒性的理性，以及塑造了個人的本能慾望與志向，掩蓋了真假意識間的區別的預處理深度。因為實際上，對管制而非物理的控制（飢餓、人格信賴、暴力）的利用，重體力勞動特性的變化，或職業階層的同化，或消

^① 瑟奇·馬利特：《技術的報答》，見《舟》，第 25 期，巴黎 1955 年版，第 40 頁。關於美國的整合趨勢，這有一個由一位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領導人作出的令人驚訝的陳述：“……我們常常在大會大廳開會，議論工人們所發的牢騷和不滿及我們打算就這些幹點什麼。到我安排了第二天的管理會議的時候，問題已被糾正，而工會並不因平息了這種不滿而出名。它已成了出名的勝利……我們為企業而奮鬥的一切，現在正逐漸交給了工人。我們必須發現的東西，便是工人想要而僱主不願意給的東西……我們正在尋找。我們正在探求。”《工人看勞動：一次談話》聖巴拉民主制度研究中心，1963 年版，第 16—17 頁。

費領域的平等化，所有這些都不能抵消這一事實：對生與死、個人與國家安全的決定是在個人無法控制的地方作出的。發達工業文明的奴隸們是升華了的奴隸，但畢竟還是奴隸，因為奴隸制之確立

既不靠壓服，也不靠勞動的冷酷，而是靠作為純粹工具的地位和把人降低為物的狀態。^④

這是一個純正的奴役形式：作為工具、作為物而存在。而且，如果物被賦予了生命，並選擇自己的物質與精神食糧，如果他沒有感到自己是物，如果他是一件漂亮、潔淨且可運動的物，上面那種生存方式並未結束。相反，由於具體化傾向於根據它的技術形式而成為極權主義者，組織者和管理者日益依賴於他們組織和管理的機器。這種相互依賴不再是主僕之間的辨證關係——辨證關係已在相互認識的努力中打破，它已成了一個把主僕全部包攬了進來的惡性循環。技術專家統治那些把他們作為自己的設計者和執行者來依賴的其他人嗎？或者說，技術專家的統治就是對這些人的統治嗎？

② 贅責“經理革命”這一意識形態還有必要嗎？資本主義生產通過了剩餘價值的私人佔有與使用目的的私人資本投資而進行，而資本是人統治人的社會工具。這一過程的根本特徵，決不會由於股東化的擴大及佔有權與管理權的分離等而變化。

③ 見本書第9—10頁。

④ 弗朗科西斯·佩羅克斯：《和平共存》，巴黎，1958年版，第三卷，第600頁。

當今高度技術性的軍備競賽的壓力，已從相關政府官員手中接過了作出關鍵性決定的主動權與決策權，並把它交給了由龐大的工業帝國僱傭並對他們的僱主利益負責的技術專家、科學家和設計者。他們的工作就是憑空想出些新的武器系統，並說服軍事人員，他們的軍事職業及國家未來取決於購買他們憑空想出的東西。^①

正如生產性機構的自我保存及增長依賴於軍隊，軍隊同樣依賴於企業，“不僅是為了它的武器，也為著有關需要什麼武器、這些武器將耗資多少以及要等多長時間才能取得這些武器的知識。”^②惡性循環似乎的確是這樣一個社會的本來面目，這個社會在它自己的預定方向上自我膨脹和自我永恒化——由它同時產生包容的日益增長的需要所驅動。

包容的前景

存在著這條日益增長的生產率與壓抑的鏈條可以打破的前景嗎？回答它要求假定一個相對正常的進化，即忽略核戰爭的現實可能性，嘗試著把當代的發展外推到將來。按照這一假定，敵人將保持永存——也就是說，共產主義將繼續與資本主義

① 斯圖爾特·米查姆：《勞工與冷戰》，費城，1959年版，第9頁。

② 同上。

共存。同時，後者將繼續有能力維持甚至提高每日增加的那部分人口的生活水準——儘管有破壞手段的加緊生產以及對資源與能力的有組織的浪費，而且上述任務也靠此來完成。儘管有法西斯主義制度帶來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不可估量的物質與精神倒退，這種能力還是表現了出來，並且是通過大戰與倒退表現的。

這種能力的物質基礎將可以在以下方面繼續得到：

- (a) 日益增長的勞動生產率（技術進步）。
- (b) 下層人口出生率的增長。
- (c) 永恒存在的國防經濟。
- (d) 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治整合，以及它們與不發達地區關係的建立。

但社會生產能力與對它們的破壞性和暴虐性利用之間延續不斷的衝突，又使得把工具的要求強加到人民頭上去的努力成爲必要——以擺脫過剩能力，創造出購買那些必須以有利可圖方式所出售的商品的願望，創造出生產與提升的願望。於是，這一制度趨向於總體管制及對管制總體的依賴，這種依賴是通過控制社會與私人管理，強化國家公司和私人企業的利益與它們的消費者和奴僕們的利益間先定和諧實現的。無論是部分國有化，還是擴大工人對管理與利潤的參與，本身都改變不了這種統治制度——只要工人自身還保持爲一支堅定可靠的力量。

存在著來自內外兩方面的離心趨勢。一個內在於技術進步自身之中，也即自動化。我已揭示出，膨脹的自動化不只是機械化的量的增長——它是基本生產力特性的變化。^①看來，作

爲技術可能性限度的自動化，與建立在生產過程中對人的勞動力私人剝削基礎上的社會並不相容。幾乎在自動化成爲現實的前一世紀，馬克思就展望過它的爆發性前景：

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於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於在勞動時間內所運用的動因的力量，而這種動因自身——它們的巨大效率——又和生產它們所花費的直接勞動時間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決於一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進步，或者說取決於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勞動表現為不再像以前那樣被包括在生產過程中，相反地，表現為人以生產過程的監督者和調節者的身份同生產過程本身發生關係……工人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主要當事者，而是站在生產過程的旁邊……在這個轉變中，表現為生產和財富的宏大基礎，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勞動，也不是人從事勞動的時間，而是對人本身的一般生產力的佔有，是人對自然界的了解和通過人作為社會體的存在來對自然界的統治，總之，是社會個人的發展。現今財富的基礎是盜竊他人的勞動時間，這同新發展起來的大工業本身創造的基礎相比，顯得太可憐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因而交換價值也不再是使用價值的尺度。群衆的剝

① 見本書第 29 頁。

餘勞動不再是發展一般財富的條件，同樣，少數人的非勞動不再是發展人類頭腦的一般能力的條件。於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便會崩潰……^①

看來，自動化的確是發達工業社會最主要的催化劑。它是質變的物質基礎中一個爆發性或非爆發性觸媒，是從量到質轉化的技術手段。因為自動化的社會過程表現了勞動力的轉變或質變，其中，勞動力與個人分離，變成了一個獨立的生產客體，因而也就變成了自在的主體。

一旦自動化變成了物質生產過程，就將使整個社會發生革命性變革。人的勞動力的具體化，一旦趨於完善，就會通過砸斷把個人束縛到機器上的鎖鏈——即他自己的勞動通過奴役他自己的機器——而破壞這種具體化了的形式。必然王國的完全自動化，將開放自由時間面，以便人類的個體與社會存在能夠自我實現。這將是向新文明的歷史飛躍。

在發達資本主義的現階段，組織起來的勞工正義地抗拒著自動化而沒有補考就業，他們堅持在物質生產中擴大對人的勞動力的使用，以此對抗技術進步。然而，在這樣做時，他們也反對對資本的更有效的利用；阻止強化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努力。換言之，對自動化的持續抑制，可能削弱資本的國際國內競

^① 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柏林狄茨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592—593 頁。也見我的英譯本，第 596 頁。（這裏採用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譯文見該文集第 46 卷下冊，第 217—218 頁——譯者注）。

爭地位，引起長期停滯與倒退，後果便是激化階級矛盾。

隨著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間的鬥爭從軍事方面上升到社會經濟領域，這種可能性變得越來越現實。一旦達到一定技術水平，依賴總體管制的力量，蘇聯系統中的自動化能夠更快進行。競爭對手對其國際地位的威脅，迫使西方世界加速生產過程的合理化。這樣的合理化遭到工人的頑強抵抗，但這種抵抗不是靠政治上的激進實現的。至少在美國，勞工領導在目的與手段方面並未越出國家與集團利益的共同框架，集團利益服從於國家利益，或受到國家利益的影響。這些離心力量仍然是可以在這個框架以內對付的。

在此，生產過程中人的勞動力比例日益降低，也意味著對立面政治力量的衰落，從這一過程中白領成份日增看來，政治激進只得由白領集團中獨立政治意識與行動的實現來完成——這在發達工業社會是相當不可能的。把日增的白領成份組織到工業工會中去的傾向，如果完全成功，可能導致這些人群工會意識的增強，但很難導致他們的政治激進。^①

在政治上，更多的白領工人在工會中的出現，將給思想開明的工人代言人一個更真實地把“工人利益”與作為整體的共同體的利益統一起來的機會。作為壓力集團的工人羣衆基礎將進一步擴大，工人代言人將不可避免地捲入涉及國家政治經濟的更廣泛的契約中。

^②

^① 同 28 頁注^②，第 11—12 頁。

在這種情況下，對離心趨勢流水般包容之前景，主要取決於既得利益集團調節自身及其經濟以適應福利國家要求的能力。大大增加了政府開銷與指導、國家及國際範圍內的規劃、擴大的對外援助計劃、綜合的社會保險、規模宏大的公用事業、或許還有部分國有化，都屬於這種要求。^③我相信，佔統治地位的利益集團將漸漸地、猶豫不決地接受這些要求，並把他們的統治權托付給更有效的力量。

現在轉向另一工業文明的系統，即蘇聯包容社會變化的前景^④，討論一開始就面對雙重不可比性：(a) 按年代順序，蘇聯處在工業化早期，很多方面仍處於前技術階段，而且(b) 從結構上說，它的經濟與政治制度根本不同（全面國有化與獨裁）。

這兩方面相互聯繫，增加了分析的難度。歷史上的落後不僅能夠，而且迫使蘇聯的工業化以這樣一種方式進行：沒有有計劃的浪費與衰退，沒有私人利益強加給生產率的限制，但有計劃地在優先考慮軍事與政治需要之後甚至同時滿足仍未滿足的生活需要。

^② 賴特·米爾斯：《白領》，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319—320頁。

^③ 那些工人們鬥志昂揚，工人運動的波濤還很活躍而不那麼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法國、義大利），它們的力量消耗於以獨裁主義形式反對加速的技術與政治合理化。國際鬥爭的迫切需要，很可能強化後者，並促進與最發達工業地區的主導趨勢的適應與聯合。

^④ 下面的內容，見我的《蘇聯的馬克思主義》，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58年版。

這種工業化的更顯著合理性，僅僅只是歷史落後性的標誌與優勢，一旦達到發達水平就很可能消失嗎？另一方面，在與發達資本主義競爭性共存的條件下，通過獨裁政權強化對所有資源的發展與控制的，不也是同樣的歷史落後性嗎？而且在達到了“趕上和超越”的目標之後，蘇聯就能使極權主義控制寬鬆到能夠發生質變的程度嗎？

從歷史落後性得出的論點——按照這一論點，在當前物質與知識不成熟的條件下，自由必然是暴力與管制的工作——不僅是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也是從柏拉圖到盧梭這些“教育獨裁”理論家的核心觀念。它很容易受到嘲弄，但又很難駁倒，因為它存在沒有太多虛偽就承認了服務於阻礙真正理智決定的（物質和精神）條件的優點。

而且，這一論點暴露了關於自由的壓抑的意識形態，按照這種意識形態的觀念，人的自由能夠在一種勞苦、貧困和愚昧的生活中存在。的確，社會在其成為一個自由社會之前，必須首先為它的所有成員創造出自由的物質前提；在得以按個人自由發展的需要進行分配之前，必須首先創造出財富；在它的奴隸們懂得正在發生什麼事以及他們能夠做些什麼來改變它之前，必須首先能夠使他們學習、觀察與思考。而且，在奴隸們已被預處理，以便作為奴隸生存下去且對這一角色感到滿意這個程度上，他們的自由看來必然自上自外而來。他們必須“被迫自由”，“被迫按事物本來面目有時甚至按它們應當呈現的面目觀察事物”，必須向他們表明他們正在尋求“善道”。^①

^① 卢梭：《社會契約論》卷I，第七章；卷II，第六章——另見本

但儘管有這樣的真理在，這一論點還是不能回答這古已有之的問題：誰教育教育者？他們擁有“善”的證據在何處？如果說它同樣適用於決定命運的、對一個國家來說什麼是善的判定由挑選出來的代表作出（或由選出的代表審定）——這些代表是在有效的，自由接受灌輸的條件下選出的——的民主政府形式，並不能證明其不合理。“教育獨裁”的唯一可能的托辭（它夠弱的了！）仍然是，它所涉及的巨大風險可能並不比真正開明的極權主義社會現在所冒的風險更大更可怕，代價也可能不比後者更高。

然而，辯證邏輯反對僵死事實和意識形態措詞，它堅持認為，奴隸們必須在他們能夠變得自由之前對他們的解放是自由的，目的必須在獲得自由的手段中起作用。馬克思的命題——勞動階級的解放必須是勞動階級自己的行動——先驗地規定了這一點。社會主義必須隨著革命的第一個行動而成為現實，因為它已存在於那些進行這場革命的人的意識與行動中了。

的確，存在著一個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階段，這期間，新社會“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②但在這一階段開始時，舊社會到新社會的質變就已出現了。照馬克思看來，“第二階段”完全是在第一階段規定好了的。由新的生

書第7—8頁。

^②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II卷，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頁。（這裏採用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的譯文，見該選集第三卷，第10頁。譯者注）

產方式產生的質上全新的生活方式出現於社會主義革命裏，社會主義革命便是終點，且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終點。社會主義建設隨著革命的第一階段而開始。

據此看來，從“按勞分配”到“按需分配”的轉變是由第一階段決定的——不僅由技術與物質基礎的創造決定，而且由（這一點是決定性的！）它所被創造的方式決定。生產過程由“直接生產者”控制，應該促進把自由人的歷史與人類前史區分開來的發展。它是這樣一個社會，其中從前的生產率要素第一次變為計劃和運用他們的勞動工具實現自己崇高需要和能力的人類個體。人在歷史上第一次，在限制他們自由與人類的必然性之下與它相對抗地、自由而集體地採取行動。因此，全部由必然性所強加的壓抑將是真正自我加強的必然性。與此概念形成對比，當前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把質變推遲（或由於國際形勢而被迫推遲），到第二階段，而且，儘管有這場革命，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仍然作為一種質變出現。勞動工具對人的奴役，以高度合理化、高效且前途大得多的形式繼續下去。

敵對並存形勢可能解釋了斯大林主義工業化令人毛骨悚然的特徵，但它也發動了傾向於使作為統治手段的技術進步永恒存在的力量；手段妨礙了目的。如果再次假定沒有核戰爭或其他災難打斷這種發展，技術進步將促進生活標準的持續提高，促進對控制的持續寬鬆。國有化經濟能夠沒有結構阻力地開發資本和勞動生產率，同時又大大縮短工作時間並增加生活的舒適。^①而且，它能夠完成這一點而又不放棄對人民總體上的管

制。沒有理由假定，技術進步加上國有化能促進對否定力量的“自動”解放與寬鬆。相反，日益增長的生產力與它們的奴役組織間的矛盾——甚至斯大林都公開承認這是蘇聯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個特徵^②——很可能緩和而不是激化。統治者能夠拋出的消費品越多，下層人就越是牢固地受各種各樣的統治官僚束縛。

但是，雖然蘇聯系統包容質變的前景似乎與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相一致，但社會主義生產基礎引出了一個決定性的差別。在蘇聯系統中，生產過程的組織肯定把直接生產者（勞動者）與對生產手段的控制分開了，這就有利於處於該系統根基上的階級差別。這種分離，在布爾什維克革命短暫的“英雄時期”之後便由政治決定與權力所確立，且從那時起永久性地保持了下來。而且，它並不是生產過程本身的動力，與從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派生出來的勞資分離一樣，此處的分離並沒有被確立到生產過程中去。其結果，統治階層自身也可與生產過程分離開來——即他們可以被取代而基本社會制度不被推翻。

在蘇聯的馬克思主義的這一論題中，有一半真理，這就是當前“落後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特性”間的矛盾能夠沒有爆發就加以解決，這兩個因素之間的“適應”可以通過“漸變”出

① 關於內在阻力與易於對付的阻力之間的區別，見我的《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同 40 頁注④，第 109 頁以下。

②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1952 年），見利奧·格魯利奧（編），《當代蘇聯政策》（紐約普魯格，1953 年），第 5、11、14 頁。

現^①。另一半真理是，量變仍然得轉化為質變，轉變到作為加在個人頭上的獨立力量的國家、政黨、計劃等等的消失。由於這一變化留下有社會的物質基礎（國有化生產過程）未被觸動，它就只限於一場政治革命。如果它能導致人的生存根基即必要勞動方面的自決，那便是歷史上最激進最徹底的革命。對生活必需品的分配無視工作成績，工作時間縮短到最低限度，有利於可變換分工的全方位普及教育——這些都是自決的前提條件，但不是其內容。雖然這些前提條件的創造仍然可以是附加管制的結果，但這些條件的確立却意味著此種管制的終結。確實，一個成熟而自由的工業社會，將繼續依賴於涉及到作用不等的勞動分工。這種不平等，由於真正社會需要，技術要求及個人間體力與腦力的差別而成爲必要。然而，執行與監督作用將不再產生根據某一特殊利益支配他人生活的特權。向這樣一個社會轉變是一個革命而非進化過程，甚至在完全國有化和計劃經濟基礎上仍然如此。

人們能不能設想，以其既定形式，共產主義制度會發展（~~而切~~地說是由於國際鬥爭而被迫發展）促進這樣一種轉變的條件？存在著強有力的論據反對這個假定。其中一種論據強調盤踞要位的官僚所產生的阻力——這種阻力在激勵創造自由的前提條件的同一基礎中找到了它存在的理由，這就是與資本主義世界生死攸關的競爭。

人們可以不要人性中固有的“權慾”這個概念。這是個極

① 同 44 頁注②，第 14—15 頁。

爲含糊的心理學概念，明顯不適合用來分析社會發展。問題並不是一旦可能發生質變的水平達到了，共產主義官僚是否會放棄他們的特權地位，或是他們能否阻止這一水平的達到。爲了實現這一點，他們就必須在統治依然是合理的，有利可圖的這一程度上，在下層群衆依然能被束縛於工作和國家利益或其他既定制度這一程度上，阻止物質與知識的增長。在此，老早就出現了兩大對抗社會內部形勢中的一個決定性因素的，似乎又是它們全球並存的形勢。全面利用技術進步和根據高生活標準生存的需要，可能證明比既得官僚的阻力要強大。

我很願意對經常聽到的觀點，即落後國家的新發展可能不僅改變發達工業國家的前景，而且構成了可能成長的一支相對獨立力量的“第三力量”提出幾點補充評論。按照前面的討論，存在著任何表明從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可能走與資本主義和當今共產主義根本不同的工業化道路的證據嗎？在土生土長的文化與傳統中，有任何揭示這樣一種替代的東西嗎？我將把我的評論限於已處於工業化過程的落後模式——即限制在那些工業化與未受破壞的前工業和反工業文化並存的國家（印度、埃及）。

這些國家帶著它們未受過促進生產率、效率和技術進步觀念訓練的人民投入到工業化過程中。換言之，它們的大部分人口仍沒有轉變爲與生產資料相分離的勞動力量。這些條件有利於工業化與自由的新匯合——即一種既根據下層人民的生活需要又與緩和生存鬥爭的目標相一致的建立生產機構的根本不同的工業化模式嗎？

這些落後地區的工業化並非在真空中發生。它出現在這樣

一種形勢下：原始積累所要求的社會資本這時必須主要從外部獲得，從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集團——或從兩者——獲得。另外，有一個廣泛流傳開來的假定，即維護獨立要求迅速工業化，要求獲得在與兩個超級大國的競爭中至少保持相對自主性的生產率水平。

在這種形勢下，不發達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必須儘可能快地拋棄前技術形態。在那些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還遠未滿足的國家，在那些可怕的生活標準要求居先，同時要求生產的量和機械化及標準化生產與分配的國家，這一點尤爲突出。而且也是在這些國家中，前技術甚至前資產階級的習俗和條件的沈重負擔，向這樣一種附加發展施加了強大阻力。機器過程（作為社會過程）要求服從一個無個性特徵的權力系統——要求總體世俗化並摧毀那些其非神聖化（*de sanctification*）過程幾乎尚未開始的制度及價值觀念。人們能否合理地假定，在兩個總體技術管制的大系統影響下，這種阻力的消除將以開明且民主的形式進行？同時，這些不發達國家能否進行歷史的飛躍，由前技術社會進到受控制技術手段可能爲真正的民主提供基礎的後技術社會？相反，情況倒顯得是，這些國家的附加發展將帶來一個總體管制時期，這種管制甚至比建立在自由主義時代成就基礎上的發達社會曾經歷過的更殘暴更牢固。總之，落後地區很可能要麼屈服於某一種新殖民主義，要麼屈服於一種或多或少令人恐怖的原始積累制度。

然而，另一種選擇似乎是可能的①。如果落後國家的工業

① 以下所說，見勒內·杜蒙所寫著作，特別是《可生土地》，巴黎

化和技術引進遇到來自土生傳統的生活與勞動方式的強大阻力——一個甚至展望到更好更輕鬆自得生活的實在前景時都不會被消除的阻力——這種前技術傳統自身能變為進步與工業化的源泉嗎？

這樣一種土生的進步（*indigenous progress*）要求一種有計劃的政策，這種政策不把技術加到傳統生活與勞動方式上，而是在它們本身的基礎上進行擴展與改進，鏟除基礎中使基礎不能保證人的生存發展的壓迫及剝削的（物質和宗教）努力。社會革命、土地改革及過剩人口的減少將是必要條件，但不是仿照發達社會模式的工業化。在那些自然資源如果從抑制性侵佔中擺脫出來，就不僅對物資來說充足有餘而且對人的生活也足足有餘的地區，土生的進步似乎確實是可能的。而在那些資源不足的地方，難道它們不能在傳統形式框架內靠逐步和零碎的技術援助而變得充足？

如果情形確是這樣，那麼，那些古老而發達的工業社會中不存在（以前也從未存在過）的條件可以佔主導地位——也就是說，“直接生產者”自身有機會靠他們自己的勞動與閒暇、靠他們自己的進步創造出條件並決定進步的速度與方向。自決將從根本上進行，而為著生活必需品進行的工作可以超越自身走向為著使人滿足的東西的勞動。

但即使在這些抽象的假定下，也必須承認對自決的粗暴限制。欲通過推翻物質和精神剝削確立新發展先決條件的初級革命，很難想像為本能行動。而且，土生的進步以兩大工業勢力

集團——正是它們塑造了當今世界——政策中的變化即放棄各種形式的新殖民主義為前提。但在目前，沒有這種變化的任何跡象。

福利與福利國家

總而言之，由技術理性政策提出的包容變化的前景，取決於福利國家的前景。這樣一個國家似乎能夠提供受管制生活之標準，這種能力內在地存在於所有這樣的工業社會，其中流水線技術手段——作為超乎個人之上的獨立力量建立起來——在作用上依賴於生產率的強化發展與膨脹。在這種條件下，自由與對抗的衰微並不是一個道德或精神的墮落或腐化問題。由於對日益增加的產品與服務的量的生產和分配使得人們承認了理性技術態度，還不如說這是一個客觀的社會進步。

然而，即使有它的合理性，福利國家還是不自由的國家，因為它的總體管制是對（a）技術上可能的自由時間①；（b）技術上可達到的用於個人生活需要的產品與服務的質和量；（c）能夠（有意或無意）理解和認識自決的可能性的智慧的系統限制。

後工業社會已增加而不是減少了（作為整體的社會，如果不是個人的話）對寄生和異化作用的需要。廣告宣傳、公共關係、灌輸、有計劃的報廢，這些不再是非生產性的企業一般管

① 是“自由”時間，不是“空閒”時間。後者在發達工業社會很充裕，但在受到企業與政治支配這個意義上，它並非自由。

理費用成本，而成了基本生產成本的要素。為其有效性，這種社會必要的廢物生產就要求繼續合理化——對先進科學技術的無情使用。其結果，一旦某一落後水平被克服，日益提高的生活標準就成了政治上受控制的工業社會的幾乎不可避免的副產品。日益提高的勞動生產率創造出了日益增多的剩餘產品，這些剩餘產品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利用和分配，都允許增長消費——儘管有生產率的轉向。只要這種並列關係佔統治地位，它就減少自由的使用價值；如果受管制的生活是舒適甚至“善的”生活，就沒有任何理由堅持自決。這是對立面統一的合理而必需的土壤，也是單面政治行為的土壤。在這種土壤裏，社會內的超越政治力量受到抑制，而質變只有作為外來的變化才顯得有可能。

根據抽象的自由觀念拒斥福利國家幾乎沒有什麼說服力。作為前兩個世紀現實成就的經濟與政治解放的喪失，看來只不過是能夠使受管制的生活安全且舒適的國家中一個微不足道的損失^①。如果個人在對政府賦予他們的產品和服務感到滿意這個程度上得到滿足，他們又為什麼堅持不同產品與服務的生產要有不同的制度機構呢？而且，如果個人受到預處理，因而使人滿足的產品也包括思想、感情和志向，他們又為什麼希望自己思考、感覺和想像呢？的確，所提供的物質與精神產品可能很糟糕且粗陋——但時代精神與知識並不提出反對滿足需要的證明。

為著其合理性，根據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不管有無“新

的”這個前輟，對福利國家的批評，以福利國家已超過的那些條件——低水平的社會財富與技術——的存在為前提。這種批評的有害一面，表現在對綜合性社會立法及用於服務而非軍事防禦的適當政府發出的反對中。

對福利國家壓抑能力的指責，就這樣用來保護了福利國家以前的社會壓抑能力。在資本主義最發達階段，這種社會便是一個被抑制的多元主義系統，其中，相互競爭的制度在強化超乎個人之上的整體力量時攜手合作。而且，對於受管制的個人來說，多元主義管制遠比總體管制要好。一種制度可以保護他，以反對另一種制度；一個組織可以減輕另一個組織的影響；逃避與補救的可能性是可以計算的。法的統治，無論怎樣嚴峻，仍然比沒有法律或超越法律的統治安全無數倍。

然而，照目前的趨勢看，這種多元主義形式是否加速了多元主義的滅亡這個問題必須提出來。發達工業社會的確是一個由相互對抗的力量組成的社會。但這些力量在更高的聯合中——在捍衛和抬高已有地位、對抗歷史替代、包容質變的共同利益中——相互補償。相互對抗的力量並不包括那些與這一整體相對抗的力量^①。他們傾向於使這個整體免受內外否定的影響；包容的外交政策就是包容的國內政策之延伸。

多元主義的現實變成了意識形態的、欺騙性的。它似乎擴

^① 對加爾布雷斯意識形態概念批評性的和現實主義的評價，見厄爾·萊瑟姆的《現代社會中的企業》，劍橋大學出版社 1959年版，第223—235—236頁。

① 見本書第4頁。

大而不是減少了控制與調節，促進而不是抵制帶來災難的整合。在使敵人成為該系統內的一股不共戴天的力量方面，自由制度完全比得上極權主義制度。而且，根據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變成了一個防禦社會這一事實，而不是根據防禦“方面”的重大經濟影響，這支要命的力量刺激了增長和主動性。因為敵人是永恒的。他不在緊急形勢中，而在正常事態中。平時與戰時他都是個威脅（平時的威脅也許比戰時的更大），他就這樣作為一種內聚力被加進了該系統中。

增長的生產率與高生產標準都不取決於這種外來威脅，但把它們用於社會變化的包容及奴役的永恒化却有賴於此。這個敵人是全部實行與取消的共同標準。而且，他並不等於現存的共產主義或現存的資本主義——在這兩種情況下，他都是真正自由的幽靈。

再說一遍：這一整體的顛狂（*insanity*）使個體的顛狂得到解脫，並把反人性的違法犯罪轉變為一項理性事業。當人們在社會和個人權威的煽動下準備過總動員生活時，他們通情達理，這不僅是因為眼前的敵人，也是因為工業與娛樂中的投資與受僱可能性。甚至最荒謬的計算都是合理的：消滅五百萬人比消滅一千萬人更可取。沒有希望證明，靠這樣一種計算證明其防禦合理性的文明宣告了自己的末日。

在這種情形下，甚至現存的自由與逃避都落入了這個組織起來的整體內的適當位置。在這個組織化市場的現階段，競爭正在緩和還是強化為著更大更快的傾覆與萎縮而展開的競爭？各政黨正在為和平還是為更強大更昂貴的軍火工業相互競爭？“富裕”的生產正在促進還是抑制仍未滿足的生活需要的滿足

？如果第一批替代正確，當代多元主義形式當增強包容質變潛力，因而阻止而不是促進自決的“災難”。民主將作為最有效的統治制度出現。

前面各段勾勒出來的福利國家形象，是歷史上頹廢份子的形象，它介於組織起來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奴役與自由、極權主義與幸福等等之間。它的可能性由技術進步的一般趨勢充份表現出來，同時又受到爆發力量的足夠威脅。最強有力的威脅當然是這樣一種威脅，即對全面核戰爭的準備可能成為現實，威懾物也可用來阻止消除對威懾物的需要的努力。另外，阻止極權主義與幸福、操縱與民主、他治與自治之間舒適結合——簡言之，組織起來的與本能的行為、預處理的與自由的思想、權宜之計與確信等之間先定和諧的永存——也起作用。

甚至最高度組織化的資本主義，也仍然把對利潤的私人挪用與分配的需要作為經濟調節者保留了下來。也就是說，它繼續把一般利益的實現與特殊既得利益的實現結合起來。在這樣做的時候，它就繼續面臨著日益增長的緩和生存鬥爭的潛力與強化這種鬥爭的需要之間的矛盾；面臨著“對勞動的漸進廢棄”與把勞動作為利潤來源加以保護的需要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使得那些構成社會金字塔底層的人們——外來者與窮人、失業者與不可能受僱傭者、受迫害的有色種族、監獄與精神病院的居民——的非人存在永恒化。

在當代共產主義社會，外敵、落後及恐懼傳統，使“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成就的壓倒特徵永恒化。手段對目的的優先性因此加重——這種優先性只有在達到和平時才能打破——而

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繼續在全方位上通過各方面的制度不用軍事力量地進行競爭。這種和平將意味著真正世界經濟的誕生——國家政權、國家利益及國家事務，全部讓位於相應的國家間之聯合。而且，這恰好是目前世界以此為背景動員起來的可能性：

無知和無意識就這樣使得民族主義繼續佔上風。

二十世紀的武裝力量和工業，都不允許“祖國”僅僅通過背負世界範圍的軍事與經濟問題重擔的組織來為他們的安全和生存提供保障。但在東方與西方，集體信仰並沒有使自己適應現實的變遷。顯要權力人物塑造了他們的帝國，或對它們的結構進行著修補，但沒有接受經濟與政治統治中賦予這種或那種聯合以意義與有效性的變化。

而且：

受著國家和階級的蒙蔽，深受苦難的大眾四處陷入嚴峻衝突之中，在這些衝突中，他們的唯一敵人便是老練地運用著工業與權力的神秘體現的主人。現代工業與地方力量的結合，是一個比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都更加高度現實的，沒有必然辯證法所必然地要根除的罪惡。①

當今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兩大“最高”社會系統命運上的相互依賴，表達了這樣一個事實：進步與政治、人與其主人之間的衝突已變成總體性的了。當資本主義迎接共產主義的挑戰時，它也辯明了自己的能力；當合算地把阻礙這種發展的私人利益放到次要地位之後，全部生產力獲得了空前發展。當共產主義迎接資本主義挑戰時，它也同樣辯明了自己的能力：空前的舒適、自由及生活重擔的減輕。兩大系統都使這些能力受到超乎認識力之上的扭曲，而且，在兩種情況下，歸根結底，理由都相同——為反對消解統治基礎之生活形式而鬥爭。

① 弗朗科西斯·佩羅克斯：同 34 頁注④第 III 卷，第 631—632 頁。

第三章

征服不幸意識：壓抑性非昇華

我們已討論過了發達工業社會的政治整合，即一個靠日益增長的技術生產率及對人和自然日益擴大征服而成為可能的成就。現在轉向文化領域所對應的整合。在本章中，某些關鍵性文學觀念和典型形象及他們的命運，將生動闡明技術理性的進步是如何消解了“高等文化”中的對立和超越因素。這些因素事實上讓位於當代社會發達地區盛行的非昇華（*desublimation*）過程。

該社會的成就及失敗使它的高等文化歸於無效。對自主個性、人道主義、悲劇性或浪漫愛情等等的讚頌顯得如低級發展階段的理想。現在所發生的，不是高等文化向大眾文化倒退，而是現實否證了這種文化，現實超越了它的文化。今天的人不僅能做文化英雄和“半神”，他已解決了許多不可解決的問題。但他也背叛了保存在高等文化中的希望與真理。確實，文化總是與社會現實相衝突，只有少數特權人物才享受到它的恩惠，表現它的理想。兩大社會敵對圈子總是共存著；高等文化老是被攬和著，而現實很少受它的理想與真理干擾。

今天的新穎特徵，乃是文化與社會現實間的敵對通過清除高等文化——它構成了現實的另一面——中的對應、異己且超

越的因素而被緩和。雙面文化中這種消解的發生，不是通過否認和拒斥“文化價值觀念”，而是通過把它們整個地結合到一個預定秩序中，通過對它們大規模的再生產與展現。

實際上，它們充當了社會集聚的工具。在東西方的競爭鬥爭中，自由文學與藝術的偉大、人道主義的理想、個人的悲歡、個性的實現，如此等等，都是重要內容。它們作出不利於共產主義現存形式的陳述，它們每天都有人供應、被人兜售。它們與兜售它們的社會相矛盾這一事實，却無人考慮。正如人們懂得或感覺得出廣告和政治講壇並不一定是真的或對的，但仍然去聽去談，甚至讓自己受它們的指導一樣，他們接受傳統價值觀念，並使之成為他們精神貯備的組成部分。如果面向大眾的信息傳播完全和諧且經常不留痕跡地把藝術、政治、宗教和哲學與商品融合在一起，它們便使這些文化領域恢復了對它們自己的共同特性——商品形式的知覺。靈魂的音樂也是售貨術的音樂。人們考慮的不是真正價值而是交換價值。現狀的理性集中在它上面，而全部異己的理性都被融合到了它裏面。

鑑於自由和滿足這些崇高的語詞由忙於鬥爭的領導人、政客在電視、電台及講壇上講述出來，它們已變成了毫無意義的聲音，它們只有在宣傳、買賣、紀律及鬆弛等特殊情景中才獲得意義。理想與現實的這種同化，證實了理想被超越的程度。它已被從靈魂或精神或思想的人的理想化王國中拉了出來，並被翻譯成操作術語和操作問題。這裏存在著大眾文化的進步因素。這一倒轉提示了如下事實：發達工業社會面臨理想物質化（*the materialization of ideals*）的可能性。該社會的能力正漸進地縮小理想化王國——在這個王國裏，人的狀況

友及假代表之後，他得重新學習ABC。但是，他造的詞和句也許說出來非常不同，他的志向和恐懼也許同樣非常不同。

確實，這樣一種情形當是一個無法忍受的惡夢。雖然，人們能夠支持核武器、放射性塵埃、值得懷疑的食物等的繼續生產，但它們不能容忍（也為此同一原因！）被剝奪使他們能夠為他們的防衛和破壞而再生產、籌備的娛樂和教育。因而，電視之類的傳播媒介不起作用，將開始取得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實現不了的東西——該系統分崩離析。壓抑需要的創造老早就變成了社會必要勞動的組成部分——所謂必要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沒了它，既定生產方式就不能維持。重要的既不是心理學問題，也不是美學問題，而是統治的物質基礎。

第十章 結論

前進中的單面社會改變了理性的東西與反理性的東西之間的關係。與其理性的幻想和瘋狂方面相對照，反理性的王國變成了真正理性的東西的大本營——成了“促進生活藝術”的觀念的大本營。如果既定社會管理著所有正常的傳播媒介，按照社會的要求來使之靈驗或失效，那麼，異於這些要求的價值觀念除了反常的媒介外，就沒有別的傳播媒介了。使作家和藝術家能夠按真名實姓稱呼人和物——命名別無他法命名的東西——的美學面，仍然保留了表現的自由。

我們時代的真實面目顯露在塞謬爾·貝克特的小說中；它的真實歷史記載在羅爾夫·霍克哈特的戲劇《代理人》中。在這裏，在現實中說話的是理智而不再是想像。理智證明了每一事物的合理性，同時又赦免了每一事物——與其精神相抵觸的過失除外。想像正漸漸地放棄這一正逐漸趕上並超越想像的現實。法西斯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幽靈在繼續游蕩，不僅在人們的記憶裏，而且在人類所取得的成就中——空間飛行，火箭和導彈，“小吃店下的神秘地下室”，漂亮的電子工廠，清潔衛生、帶花的床，對人確實無害的毒氣，我們都捲入其中的保密狀態。這就是人類的科學、醫學和技術的巨大成就於其中取得的場所；拯救生命和改善生活的努力是這場災難中的唯一希望。

◦ 對虛幻的可能性的故意玩弄並按照反自然的良知而行動的能力、用人和物進行實驗的能力、把幻想轉化為現實、把虛構變為真理的能力，都證實了想像已變成了進步工具的程度。而且，就像既定社會中的其他工具一樣，它受到有組織的濫用。想像力固定了政治運動的步調和風格，它遠遠超過了神話仙景裏玩弄言詞、把有意義的話變為胡說和把胡說變為有意義的話的阿里斯。

從前敵對的領域——神話與科學、生與死、歡樂與悲傷——在技術和政治的基礎上溶為一體。隨著高等核工廠和實驗室成了宜人環境中的“工業公園”，美暴露出了它的恐怖；民防指揮部展覽了“防放射性掩蔽部”，掩蔽部牆上都鋪上了（“鬆軟的”）地毯，掩蔽部內有躺椅、電視和裝飾物，它“被設計成了和平時期組合家庭房間。（原文如此！）而如果戰爭爆發則又是家庭放射性掩體”。①如果對這種實現的恐懼沒有進入到意識中，如果它真的被看作當然之事，那是因為，這些成就(a)照現存秩序看來完全合乎理性；(b)是超出傳統想像限度的人的聰明才智的標誌。

美學和現實之淫猥結合駁斥了把“詩人的”想像與科學和經驗的理智對立起來的哲學。技術的進步伴隨著意象的逐漸合理化、甚至現實化。恐怖與歡樂、戰爭與和平的典型失去了其災難特性。它們在個人的日常生活中的顯現已不再是反理性力量的顯現——它們的現代體現是技術統治的要素，並且屬於

① 據《紐約時報》（1960年11月11日）載，展覽在紐約城列克星敦路和第五十五大街民防指揮部舉行。

技術統治。

在減少、甚至取消想像的浪漫空間過程中，社會已迫使想像在新的基礎上證明自身；在這種新的基礎上，典型形象被轉換為歷史能力和歷史規劃。這種轉換將跟從事這種轉換的社會一樣糟糕和被歪曲。與物質生產和物質需要的領域相分離，想像純粹遊戲，在必然王國裏毫無用處，只服從於虛幻的邏輯和虛幻的真理。當技術進步取消了這種分離，它就被賦予了典型形象（帶有它自己的邏輯和它自己的真理）；它縮減了心靈的自由能力。但它也縮小了想像和理智之間的鴻溝。這兩種對立的能力在共同的基礎上變得互相依賴。按照發達工業文明的能力看來，想像的全部作用不就是玩弄技術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能夠根據其實現的機會，加以檢驗）嗎？“想像的科學”這個羅曼蒂克觀念似乎假定了一個日漸經驗性的方面。

想像的科學理性的特性在數學、物理科學的假說和實驗中老早已為人們認識。它同樣在精神分析中被人們認識到了；精神分析在理論上建立於承認反理性東西之特殊理性這一基礎上；被人們理解了的想像在重新定向之後，變成了一種治療力量。但這種治療力量也許遠遠超出了治療精神病的範圍。勾劃了這一前景的不是詩人而是科學家。

對問題的整個精神分析能幫助我們矯正典型形象或者至少幫助我們限制典型形象對我們的控制。然後人們就可以希望，在應允想像充份地得到其全部表達手段、全部有形形象（它們出現在自然的夢境、正常的做夢活動中）過程中，能使想像令人滿足，能賦予它以

良知。使想像令人滿足，任其施展全部活力，恰恰意味著賦予想像作為心理刺激和力量的真實功能。^①

想像仍然沒能保持不受具體化的影響。我們被典型形象所支配，我們受著我們自己的典型的折磨。精神分析很清楚地了解這一點，也懂得後果如何。然而，“賦予想像以全部表達手段”便是倒退。不健全的個人（他們的想像能力也不健全）將組織和破壞甚至多於現在容許他們所做的東西。如此鬆弛將是十足可怕的事情——不是文化的大災難，而是它最具壓抑性的傾向的自由擴張。這樣的想像不是理性的：它能變成生產手段朝緩和了的生命、沒有恐懼的生活重新定向和重新建構的先驗之物。而這絕不是那些受統治和死亡之典型形象支配的人們的想像。

解放思想，以便它能獲得它所有的表達方式，要以對更多現在是自由的且使一個壓抑的社會永存下去的東西的壓抑為前提。這樣的倒轉不是心理學或倫理學問題，而是政治學問題。它是政治學問題，是在實踐（在實踐中社會的基本制度得到發展、確立、維持和變革）這個詞已被到處運用的這一意義上說的。這種實踐是個人的實踐，而不管他們是如何組織起來的。因此，必須再一次面對這個問題：被管制的個人——他們已把不健全帶入了他們自己的自由和滿足之中，從而在擴大了的規模上再生產出不健全來。——怎樣才能使自己從自身及他們的

^① 加斯頓·貝奇拉德：《合理的唯物主義》，巴黎，1953年版，第18頁（著重號為貝奇拉德所加）。

主人那裏解放出來？這一惡性循環被打破，這一點怎樣才是甚至可以想像的？

自相矛盾的是，在回答此問題的嘗試中引起最大困難的似乎不是新社會制度這個概念。既定社會本身在增加了的計劃的方向上正在改變或已經改變了基本制度。既然對就生命基本需要的普遍滿足來說而用的全部資源的發展和利用是緩和的先決條件，那麼，它就與妨礙這個目標的實現的特殊利益的優勢不相容。質變以進行反對這些利益而維護整體的計劃為條件，唯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產生自由且理性的社會。

因而，這種制度——能夠在此制度內展望緩和——公然反對傳統的關於極權主義的與民主的、集中化的與自由的管制這種劃分。今天，對借自由民主之名而行集中規劃之實的反對（這一點事實上已被否認），是根本支持受壓抑利益的意識形態支柱。實現真正的個人自決這個目標，取決於對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和分配的——按照物質和精神文化已達到的水準——有效社會控制。

因而，技術理性（去掉其功利特徵）便是為大家計劃和發展全部可用資源的唯一標準和指南。生產和分配必需品和服務中的自決是浪費性的。這項工作是一項技術工作，而作為真正的技術工作，它有利於減少體力勞苦和腦力勞苦。在這個領域內，如果集中化的控制為有意義的自決確立了前提條件，那麼，它就是合理的。那麼，自決在它自己的領域內——在涉及到生產和分配經濟剩餘額的決定中，在個人的生存內——就能夠

變得有效。

無論如何，根據這種發展水平，集中化的權威和直接民主的聯合，受無限變化的支配。在群體消解為個人，這些個人從所有的宣傳、灌輸和操縱中擺脫出來，能認識、理解各種事實、評價各種替代這一程度上，自決才是真實的。換言之，只有在社會由本質上新的歷史主體來組織、維持和再生產這個程度上，它才是合理而自由的。

在發達工業社會目的發展階段，物質和文化系統都否認了這一迫切需要。這個系統的力量和效率以及精神與事實、思想與所要求的行為、願望與現實的徹底同化，都阻礙了新主體的出現。它們也反對這種觀念：用“來自下面的控制”來代替現有生產過程的控制，將意味著質變的出現。在勞動者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既定社會的否定者、控訴者的地方，這一觀念過去是現在仍然是站得住腳的。然而，在這些階級已變成既定生活方式支持者的那些地方，他們的地位向控制地位的上升，將在一個不同的背景下延長這一方式。

但是，證實關於這個社會及其決定性發展的批判理論的事實都擺在那裏：社會整體不斷增長的反理性；生產力的限制和浪費；侵略擴張的需要，永久的戰爭威脅；強化了的剝削；人性的喪失。而且，它們都指向歷史替代：用最小的勞苦有計劃地利用滿足維生的基本需要的資源，閒暇轉變為自由時間，生存鬥爭緩和。

但是，這些事實和替代在那兒就像並不相聯的碎片，或者就像一個無聲客體世界，沒有主體、沒有實踐使這些客體沿新的方向運動。辯證法的理論未被駁倒，但也不能提供靈丹妙藥

。它不是肯定的。確實，辯證法的概念在把握既定事實的過程中，超越了既定事實。這正是其真理性的標誌。它規定了歷史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但歷史可能性和必然性的實現只能在與理論相對應的實踐中，而目前實踐尚未作出這種響應。

在理論及經驗的基礎上，辯證法的概念宣佈了它自己的絕望。人的現實便是它的歷史，而在歷史中，矛盾並不自決和緩和的成就這兩方面的衝突可以變得明顯地超出任何可能的否認，但它也完全可以持續地是易於處理的、甚至生產性的衝突。因為，人對人的征服隨著對自然的技術征服的增長而增長。而這種征服減少了作為解放的一個必要先驗物的自由。只是在這種意義上它才是思想的自由：在此意義上，在這個受管制的世界裏，思想作為對其壓抑性生產率的意識，作為打破這一整體的絕對需要能夠是自由的。在這種絕對的需要能成為歷史實踐的推動力量，成為質變有效原因的地方，它恰恰沒有流行。沒有這種物質力量，即使最敏銳的意識也仍然是無力的。

無論這一整體的反理性特性表現得多麼明顯，也無論與此相伴的變化的必然性是多麼明顯，對必然性的洞察從沒有充份到足以抓住可能的替代。面對特定生活系統無所不在的效率，對它的替代始終都顯得不過是空想。而對必然性的洞察、對罪惡狀況的意識，甚至在這一階段都將是不充份的：此時科學成就和生產率水平已經排除了替代的空想特徵——在此，既定現實而不是其反面才是空想的。

這意味著社會批判理論放棄了這一領域，並把它留給經驗的社會學（除了方法論的指導以外，經驗社會學擺脫了所有理

論的指導，它屈從於各種被誤置的具體性的謬論，因而儘管它聲明排除了價值判斷，但仍然起著意識形態的作用？或者，辯證法的概念通過把它們自己的情形理解為它們所分析的社會情形，從而再一次證明了其真理性？如果人們恰恰在批判理論最薄弱點——它不能在既定社會以內證明解放趨勢——來考慮它，也許就有一個答案顯示出來。

社會批判理論在其誕生之際就碰到了既定社會中存在的現實力量（客觀的和主觀的）；通過廢棄已成為社會進步障礙的現存制度，當時的社會向（或能被導向）更合理的和更自由的制度發展。這是社會批判理論賴以建立的經驗基礎；而關於自由的內在可能性——物質和精神生產力、能力和需要發展（否則就是受阻和歪曲）——觀念即由這些經驗的基礎派生而來。雖沒有證明這種力量，社會批判仍然正確和合理，它不能把它的合理性轉換為歷史實踐的項目。結論呢？“內在可能性的解放”不再充份地表達歷史的替代。

發達工業社會受束縛的各種可能性是：生產力的大規模發展，征服自然的範圍的擴大，逐漸滿足增長著的人口的需要，新的需要和能力的創造。

但這些可能性正通過各種手段和制度而逐漸實現。這些手段和制度取消了它們解放的可能，而這個過程既影響了手段，也影響了目的。生產率和進步的工具被組織到一個極權主義的系統中去，不僅決定了它們現實的利用，也決定了其可能的利用。

在其最發達階段，統治作為管制發揮功能，而在大眾消費的超發達地區，受管制的生活變成了對整體來說是善的生活，

在對這種生活的捍衛中，對立各方被統一起來。這是純粹的統治形式。相反地，它的否定就顯得是純粹的否定形式。全部內容似乎都歸結為一個終結統治的抽象要求——唯一真正革命性的迫切需要及證實工業文明成就的事件。面對既定系統的有效否認，這種否定在政治上無能的“絕對拒絕”形式中出現。既定系統愈發展它的生產率、愈減輕生活的負擔，這種絕對拒絕就愈顯得不合情理。用莫里斯·布拉克特的話說：

我們拒絕的不是無價值或不重要的。恰恰因為那一點，拒絕就是必要的。有一個我們不再承認的理由，有一個使我們懼怕的智慧表象，有一個我們不再留意的一致與和解的借口。突破已經發生。我們已被降服到那樣一種不再容忍共謀的率直地步。①

但是，如果拒絕的抽象特性是總體具體化的結果，那麼，拒絕的具體根據必定依然存在，因為具體化是一個假象。據此看來，在技術理性的中介中的對立面的統一在其全部現實性上，必定是一個虛幻的統一，既沒有排除增長著的生產力和對它的壓抑性使用之間的矛盾，也沒有消除解決這個矛盾的致命需要。

但為解決這個矛盾而進行的鬥爭已發展到了不需要傳統的形式。單面社會的極權主義趨勢使傳統的抗議方法和手段無效

① 《論拒絕》，載《七月十四日》第2期，巴黎，1958年10月出版。

甚至變得危險，因為它們保護的是民衆主權的幻想。這種幻想包含有某些真理：“人民”——先前社會是變化的發酵劑——現在已經“上升”成了社會聚合的發酵劑。在此發達工業社會新的分層特徵並不在於財富的再分配和階級的平等。

然而，處於保守的民衆基礎之下的則是由流浪者和大老粗、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其他人種和其他有色人種、失業者和不能受僱者構成的下層社會。他們處在民主過程之外；他們的生活乃是終止不能容忍的狀況和制度之最直接最現實的需要。因而，他們的對抗就是革命性的，即便他們意識不到這一點。他們的對抗從外面打擊了這一系統，因此不被這個制度所左右；他們是違犯這個遊戲規則的基本力量，而在這樣做時這一遊戲作為騙局揭露出來。當他們為要求最基本的公民權利集合起來，手無寸鐵、毫無防護地走上街頭的時候，他們知道，他們面對的是狼狗、石頭、催淚彈、監獄、集中營、甚至死亡。每一個為著法律和秩序犧牲品的利益而進行的政治運動背後都有他們的力量。他們開始拒絕循規蹈矩這一事實，也許是標誌著一個時期終結的最初事實。

沒有什麼事情表明會有一個好的結局。既定社會經濟和政治的能力都是巨大的，足以允許對被迫害者作些調整和讓步，而他們的武裝力量訓練有素，裝備精良，足以應付突然事變。然而，幽靈再次出現在那裏，出現在發達工業社會的內外。與威脅著文明帝國的野蠻人的最親近的歷史一致，預先判定了這個問題；野蠻狀態的第二階段或許正是延續的文明帝國本身。但機會是，在這一時期，歷史的兩極再度相會：最發達的人性意識和最受盤剝的力量。這只不過是一個機會。社會批判理論

不具有任何概念，能把現在與未來溝通起來；它不承諾，也不炫耀成功，它始終是否定性的。因而，它想要繼續忠誠於這些人：儘管沒有希望，他們已經而且繼續在把生命獻給那偉大的拒絕。

在法西斯年代之初，沃爾特·本杰明寫道：

“只是為著那些沒有希望的人，我們才被賜予希望”。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根據波士頓燈塔出版社 1964 年版譯出編、斯圖加特，弗羅曼

西方思潮文庫選譯 ⑪

單面人

著者／〔美〕赫伯特·馬爾庫塞 著
左曉斯 張宜生 蕭濱 譯
出版／谷風出版社
社長／謝成忠
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4F
服務電話／392-2774・392-2742
郵撥帳號／0777817-3謝成忠帳戶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3649號
法律顧問／廖學興律師
版次／民國 77 年 12 月 台第一版

定 價／ 180 元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向本社更換



西方思潮文庫選譯系列

- W001 哲學的貧困 [德] 卡爾·馬克思 100 元
- W002 晚期資本主義(精裝) [比] 厄爾奈斯特·曼德爾 500 元
- W003 當代哲學主流(上卷) [德] 施太格 繆勒 450 元
- W004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350 元
論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
- W005 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 [德] 卡爾·馬克思 150 元
- W006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德] 馬克斯·韋伯 180 元
- W007 勞動與壟斷資本 [美] 哈里·布雷弗曼 280 元
- W008 黑格爾政治著作選 [德] 黑格爾 250 元
- W009 馬克思以後的馬克思主義 [英] 戴維·麥克萊倫 400 元
- W010 當代分析哲學 450 元
- W011 單面人 [美] 赫伯特·馬爾庫塞 150 元